

明代北京的瘟疫與帝國醫療體系的應變

邱仲麟*

本文主要在考察明代北京歷次瘟疫的疫情、流行過的瘟疫的病徵、城市環境衛生的變遷，與國家醫療體系在瘟疫流行期間所展開的應變措施。明代北京見諸於記載的大瘟疫，前後計有十五次，除前兩次外，均發生於一五四〇年以後，主要係出現在嘉靖、萬曆年間及崇禎末年，其中最為嚴重的是崇禎十六年（1643）的大瘟疫。就資料所載，明代北京流行過的瘟疫至少有痘疹、大頭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這幾種疫病。證據顯示，發生在崇禎十六年的疙瘩瘟及吐血瘟，極有可能是腺鼠疫與肺鼠疫。在北京歷次瘟疫爆發時，以太醫院為首的帝國醫療體系，承擔著重要的抗疫任務，在嘉靖、萬曆這兩個時期，曾發揮某程度的作用。但在崇禎十六年大疫時，帝國的醫療體系幾乎是無法招架；也就因為病菌到處肆虐，導致北京在這一年據說有二十萬以上的人口死亡，從而造成次年三月李自成包圍北京時防守人力的不足。崇禎十六年北京的大瘟疫，間接造成了北京的淪陷與帝國的滅亡。

關鍵詞：北京 瘟疫 腺鼠疫 公共衛生 醫療體系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前言

瘟疫與人類之間的糾結歷時久遠，它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曾不斷地爆發流行，除了造成人口的大量死傷之外，也常扭轉戰爭的局勢，或帶來政治、社會變遷。而隨著人群聚落的不斷出現、商路與戰線的持續向外延伸，與墾殖活動的一再增加，瘟疫的細菌、病毒也在各處散布。甚至環境生態的改變，有時也會引發病菌與人類的另一波戰爭，帶來難以想像的後果。¹

在明代 (1368-1644)，瘟疫就曾在帝國境內不斷肆虐，並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² 而瘟疫同樣也在明朝與蒙古的戰爭中，扮演著扭轉局勢的重要角色。Carney T. Fisher 即曾為文論及嘉靖年間蒙古攻入山西，因而將天花帶回蒙古草原，致使此後蒙古人遭受到極大困擾，死傷情況也相當嚴重的情況。³ 俺答之所以願意接受明帝國的冊封，不再持續敵對，雖同眾所熟知的「三娘子事件」有關，但與瘟疫造成的危害亦脫不了關係，而此正是瘟疫改變戰爭局勢的一個顯例。然而，有趣的是，關外的蒙古人與女真人，雖同樣受到天花的干擾，但後者卻從經驗中學習，並建立一套防制體系，即避痘與查痘的制度。有關於這一點，張嘉鳳在文章中曾加以探明，⁴ 她更進一步指出：也就因為女真能夠控制天花，

¹ 參見 Frederick F. Cartwright, *Disease and Histo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2); 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Garden City, NY: Anchor Press/Doubleday & Company, 1976); Arno Karlen, *Plague's Progress: A Social History of Man and Disease*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95).

² 參見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卷二八，〈五行志一·疾疫〉，頁442-443；陳高備編，《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上海：暨南大學，1939），下冊，頁1217-1238；鄧雲特，《中國救荒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臺一版），頁30, 55；汪榮祖，〈氣候變化與明代興衰〉，《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335；張志斌，〈古代疫病流行的諸種因素初探〉，《中華醫史雜誌》1990.1：30；梅莉、晏昌貴，〈關於明代傳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學學報》1996.5：80-85；邱仲麟，〈明代的疫癘——兼及官民的肆應〉（第一屆兩岸明史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96年7月23至24日〕論文），頁3。

³ 卡尼·T·費什著，張憲博譯，〈天花、商賈和白蓮教——嘉靖年間明朝和蒙古的關係〉，《明史研究》第4輯（合肥：黃山書社，1994），頁233-235。按：卡尼·T·費什即 Carney T. Fisher (費克光)。

⁴ 張嘉鳳，〈清初的避痘與查痘制度〉，《漢學研究》14.1(1996)：135-156。

故得以與明帝國纏鬥數十年，進而入主中原。⁵ 由此看來，一個民族的盛與衰，與其能否戰勝傳染病，其實有相當大的關係。

在西元十四至十七世紀，鼠疫曾在歐洲大流行，並造成相當大的人口死傷。說者或謂十四世紀中葉的黑死病源自中國，在西元一三三一年（元文宗至順二年）曾在中國嚴重流行，疫死大量人口，其後在一三三一年至一三四六年間往西橫越亞洲及東歐，進入環地中海各地，並侵襲西歐、北歐及英倫三島。⁶ 按此說法，中國在明代以前應已流行過鼠疫，而且也有不少學者持此觀點。⁷ 果真如此，明代有過鼠疫應該不令人意外。有趣的是，對於明代是否流行過鼠疫，學者的看法並不一致。事實上，早在六十多年前，伍連德（1879-1960）就曾經指出：山西潞安在崇禎十七年（1644）曾流行過鼠疫。⁸ 然而，雖然伍連德的看法有其專業的背景支持，但並非所有學者皆認同他的看法。Helen Dunstan 在二十多年前發表的論文中，曾對晚明疫病的時空分布、流行季節、死亡率、官民的反應，及瘟疫對中醫學的影響等，皆有所討論；不過，她並不認為十七世紀一連串的大瘟疫中曾有鼠疫。⁹ 其後，梁其姿亦接受此一觀點，認為鼠疫首次出現於中國，是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雲南。¹⁰ 另外，Fisher 也認為中國在十八世紀以前，

⁵ Chia-Feng Chang (張嘉鳳), "Disease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s, Diplomacy, and the Military: The Case of Smallpox and the Manchus (1613-1795),"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 57.2 (2002): 177-181, 186-188.

⁶ 參見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pp. 162-169.

⁷ 參見 Wu Lien-Teh, J. W. H. Chun, Robert Pollitzer, & C. Y. Wu, *Plague, A Manual for Medical and Public Workers* (Shanghai: Weishengshu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 p. 11; Denis Twitchett, "Population and Pestilence in T'ang China," in Wolfgang Bauer (hrsg.),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Herbert Franke*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9), pp. 42, 52; 范行準, 《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1986), 頁162-163, 241-242; 曹樹基, 〈地理環境與宋元時代的傳染病〉, 《歷史地理》第1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頁186-192。

⁸ 見Wu Lien-Teh, et al., *Plague, A Manual for Medical and Public Workers*, p. 14. 又見伍連德, 〈中國之鼠疫病史〉, 《中華醫學雜誌》22.11(1936): 1042。

⁹ Helen Dunstan, "The Late Ming 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 *Ching-Shih wen-t'i* 3.3 (1975): 1-59. 對於晚明是否出現鼠疫的討論, 見該文 pp. 22-28.

¹⁰ Angela Ki Che Leung (梁其姿), "Diseases of the Premodern Period in China," in Kenneth F. Kiple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55.

未曾流行過鼠疫。¹¹ 而 Carol Benedict 亦支持 Dunstan 的看法，不認為晚明曾有鼠疫。¹² 與此相反的是，大陸學者多半認為鼠疫在明代就已流行。李濤即認為鼠疫在明末曾嚴重流行。¹³ 范行準也認為崇禎末年曾大範圍流行鼠疫。¹⁴ 另外，馬伯英亦認為明末曾發生腺鼠疫、肺鼠疫及敗血型鼠疫。¹⁵ 梅莉、晏昌貴則因襲馬伯英的看法，認為鼠疫在明代曾有大面積的流行。¹⁶ 此外，于德源等人也指出北京在崇禎年間曾出現鼠疫。¹⁷ 曹樹基更力主在萬曆至崇禎這段期間，華北曾大規模流行鼠疫。¹⁸

對於這個富爭議性的問題，個人雖在文中也有所觸及，不過這不是本文主要的重點。在本文中，個人比較關心的是：明代的瘟疫對人群與國家產生怎樣的影響，以及國家如何與傳染病相抗。事實上，老百姓在各種危難發生時，往往沒有足夠的力量與其抗衡，而在瘟疫流行時更是如此。畢竟在瘟疫肆虐的當兒，個人其實是既無助而且無奈。明初，太祖曾於洪武三年（1370）降旨令天下設立惠民藥局，「凡軍民之貧病者，給之醫藥」。¹⁹ 又於洪武十七年（1384）下令各府州縣設立醫學，並置醫官，府設醫學正科，州置醫學典科，縣設醫學訓科。²⁰ 就整體而言，在明中葉以後，明代的地方醫療體系有逐漸衰敗之勢，但少數地方的醫療機構仍然持續運作直至明末，北京就是其中之一。²¹ 本文之所以選擇北京做為

¹¹ 費克光 (Carney T. Fisher)，〈中國歷史上的鼠疫〉，《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下冊，頁684, 687。

¹²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

¹³ 原見其〈明代醫學的成就〉(1957)，轉引自洗維遜編著，《鼠疫流行史》（廣州：廣東省衛生防疫站，1990），頁95。

¹⁴ 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頁242-243。

¹⁵ 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593-595。

¹⁶ 梅莉、晏昌貴，〈關於明代傳染病的初步考察〉，頁87-88。

¹⁷ 于德源，《北京農業經濟史》（北京：京華出版社，1998），頁254；尹鈞科、于德源、吳文濤，《北京歷史自然災害研究》（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7），頁165。

¹⁸ 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歷史研究》1997.1：17-32；《中國人口史·明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頁432-433。

¹⁹ 《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以下所引明朝各朝實錄并同），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壬申條，頁4b。

²⁰ 《明太祖實錄》卷一六二，洪武十七年六月甲申條，頁5a。

²¹ 參見 Angela Ki Che Leung (梁其姿)，“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 Zi Region,” *Late Imperial China* 8.1(1987):

考察的對象，除了其資料相對比較豐富之外，亦在於探明帝國醫療資源最為豐富的北京，如何應變歷次的瘟疫，以做為衡量其它地區醫療體系對抗瘟疫的參照點。基於此，本文將探討這一時期京城瘟疫的流行情況，與國家醫療體系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採取的因應措施，並析究流行過的瘟疫的病徵，與城市環境衛生惡化的情況。由於北京係帝國的政治中樞，瘟疫對北京所產生的衝擊，與北京是否能夠承受，對於帝國的命脈極具重要性。每一次瘟疫的侵襲，也正考驗著當時國家體系的應變能力。而當國家無法應變，這時帝國的生命可能就會出現嚴重的危機。

一、歷次瘟疫的疫情

就個人所蒐集的資料，北京在明代初期似未出現大型的瘟疫。在景泰七年(1456)冬天，北京外圍的順天府等地曾流行大瘟疫。²² 當時，疫情從冬天一直延續至隔年(即天順元年，1457)五月。所幸北京在這次瘟疫大流行時，逃過了一劫，城內並未受到波及。迨成化七年(1471)，北京才出現其在明代的首次大瘟疫。此後，直至明亡，共出現了十五次較大的瘟疫。在這十五次瘟疫當中，除前兩次外，其餘十三次均爆發於一五四〇年以後。(參見頁343表)

嘉靖以前

北京在嘉靖以前，共發生了兩次比較大的瘟疫，前一次在成化七年(1471)。成化七年的瘟疫，據陸簡(1442-1495)云：是年「城中大疫，一人受患，闔室或去之，雖父子莫或及焉」，²³ 疫情似頗嚴重。此次瘟疫肇因於前一年的直隸饑饉，至成化七年春，饑民湧至順天府及北京；迨至四月，據官員奏稱：「饑民行

139-141.

²² 事據直隸巡按御史史蘭的奏疏云：「順天等府，薊州、遵化等州縣軍民，自景泰七年冬至今春夏，瘟疫大作，一戶或死八、九口，或死六、七口，或一家同日死三、四口，或全家倒臥，無人扶持。傳染不止，病者極多。」參見《明英宗實錄》卷二七八，天順元年五月丙子條，頁11a。

²³ 陸簡，《龍阜文叢》（《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集部第39冊），卷一三，〈贈韓世資醫師序〉，頁3a。

乞於道，多有疲不能支，或相仆籍。」²⁴ 迄於五月，傳染日益嚴重，順天府尹在上奏時談到「近日京城饑民疫死者多」，乞請撥款令各坊火甲瘞埋。²⁵ 爲此朝廷也做出了回應，在城門外設了許多的漏澤園，以收瘞遺屍。²⁶ 從資料看來，這一年的瘟疫，可能在春末已經潛伏，至陰曆四、五月疫情轉爲嚴重，六月以後未見記載，似乎是漸漸消散了。

另據記載，北京在弘治十一年（1498）夏天，曾經「痘疾盛行」，²⁷ 至於其詳細情況如何，則不清楚。

嘉靖後期

北京在嘉靖中葉以後，再度出現嚴重的瘟疫。據現存資料記載，嘉靖中葉以後，北京發生了六次瘟疫，分別爲嘉靖二十一年夏、二十四年春、三十三年夏、四十年春、四十二年夏及四十四年春。

嘉靖二十一年（1542）五月，北京瘟疫大行。據禮部左侍郎孫承恩（1485-1565）等奏言：「臣等竊見比者時當盛夏，炎氣鬱蒸，積滲成災，散爲疫癘。傳聞都城內外，民無老幼，傳染甚多，僵仆相繼。」²⁸ 疫情似乎相當嚴重。其後，據零星資料記載，北京又間歇性地發生了五次的瘟疫，即：（1）嘉靖二十四年（1545）春正月，「民多疾疫」。²⁹（2）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都城內外大疫。³⁰（3）嘉靖四十年（1561），京師因「春冷，人多生疾」。³¹（4）嘉靖四十二年（1563）夏，「天災流行，民多病疫」。³²（5）嘉靖四十四年（1565）正月，

²⁴ 《明憲宗實錄》卷九〇，成化七年四月壬申條，頁8a。

²⁵ 《明憲宗實錄》卷九一，成化七年五月乙亥條，頁1a。

²⁶ 《明憲宗實錄》卷九一，成化七年五月辛巳條，頁2a。

²⁷ 王鏊，《震澤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56冊），卷一一，〈贈陳希夷序〉，頁9b-10a。

²⁸ 見孫承恩，《文簡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1冊），卷五，〈請九門施藥疏〉，頁11a。《明世宗實錄》卷二六一，嘉靖二十一年五月丁酉條，頁2a-b。

²⁹ 《明世宗實錄》卷二九四，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己酉條，頁2b-3a。

³⁰ 《明世宗實錄》卷四〇九，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乙亥條，頁2a。

³¹ 《明世宗實錄》卷四九三，嘉靖四十年二月戊申條，頁4a。

³² 張瀚，《松窗夢語》（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卷五，〈災異紀〉，頁99。

京師民饑且疫。³³ 在此六次瘟疫中，發生在春初的計有三次，在夏季的亦有三次。至於傷亡情況如何，由於未見記載，無法得知。

萬曆年間

萬曆年間，北京的瘟疫計有五次，分別出現在萬曆十年、十五年、三十六年、四十年及四十五年。其中萬曆十年、四十年，可以確定是大頭瘟；萬曆十五年，則見載是羊毛疔。至於萬曆三十六年、四十五年所疫為何症，則不得其詳。

萬曆十年（1582）北京瘟疫的疫情，據實錄記載：該年三月，「京城內外，災疫流行，人民死者甚眾」。神宗於是傳示禮部，命其擇日祈禱。³⁴ 但到四月，疫情未見稍減。³⁵ 迄至五月間，瘟疫猶然盛行，營軍傳染，死者極眾。³⁶ 北京這一年的瘟疫，係由塞外傳來。據康熙《懷來縣志》記載：萬曆九年（1581），懷來當地「人腫頸，一二日即死，名大頭瘟。起自西域，秋至本城，巷染戶絕。冬傳至北京，明年傳南方」。³⁷ 按此記載，萬曆九年秋，大頭瘟由西域傳至宣府鎮的懷來，入冬後傳至北京，萬曆十年以後擴散至京師以南。則北京在萬曆九年的冬天，其實已存在此一疫病，只是在萬曆十年三月以後才大規模流行。當時疫情極為嚴重，刑部郎中舒邦儒（?-1582）家中亦染疫，「妻女僮僕，死者什九」，最後全家僅餘一襁褓小兒。幸賴同年江東之（?-1599）前往抱歸，香火得以延續。然而，由於當時北京「最苦疫傳染」，因此江東之的家人對於此舉「多怨之」，深怕他把病疫帶回家中。³⁸

³³ 《明世宗實錄》卷五四二，嘉靖四十四年正月乙丑條，頁4b。

³⁴ 《明神宗實錄》卷一二二，萬曆十年三月辛未條，頁6a。

³⁵ 《明神宗實錄》卷一二三，萬曆十年四月癸卯條，頁4b-5a。

³⁶ 《明神宗實錄》卷一二二，萬曆十年三月辛未條，頁6a；卷一二三，萬曆十年四月乙巳條，頁5a；卷一二四，萬曆十年五月乙丑條，頁4a。

³⁷ 康熙《懷來縣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康熙51年刊本），卷二，〈災異〉，頁16b-17a。

³⁸ 此事見載於丁元薦，《西山日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2冊），卷下，總頁741。丁氏在《西山日記》中，並未語及病疫者為何人。據沈思孝所撰〈明故中議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所江公墓誌銘〉載其事云：「刑部郎舒邦儒，公同年也，閨門病疫死，僅遺一歲孤，公即抱歸乳之。」見江東之，《瑞陽阿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67冊），卷首，頁13b。

至於萬曆十五年（1587）北京的瘟疫，其疫情亦不小。據《明神宗實錄》記載：該年的五月，北京疫癘盛行，死者甚眾。³⁹ 又據《名醫類案》記述，流行的是叫羊毛疔的怪病：

萬曆丁亥（十五年），金臺有婦人，以羊毛遍鬻於市，忽不見。繼而都人身生泡瘤，漸大，痛死者甚眾，瘤內惟有羊毛。有道人傳一方，以黑豆、菽麥為粉塗之，毛落而愈，名羊毛疔。⁴⁰

由此可見，當時人們對於瘟疫的病因並不甚清楚，故將此疫與賣羊毛的婦人連繫在一起，而認為她是羊毛疔爆發的根源。雖然其中涉及神祕性的解釋，但從記載中可知它是一種身體會起泡瘤，而且劇痛的疾病。

另外，萬曆三十六年（1608），京城又癘疫大作，「死者相枕」。⁴¹ 至萬曆四十年（1612）三月，由於直隸北部饑饉荒旱及疫癘，流民湧入北京，瘟疫隨之大行，都城內外，饑者、病者甚多。⁴² 根據資料記載，該年北京直隸曾再度流行大頭瘟，⁴³ 則是年北京所盛行的瘟疫，應該也是大頭瘟。而在萬曆四十五年（1617），因畿輔大旱，隨之發生瘟疫；六月時，「都城內外，癘疫盛行」。⁴⁴

崇禎末年

在明代北京的十餘次瘟疫當中，最為嚴重的當屬崇禎末年的瘟疫。在這段期間，曾爆發兩次嚴重的瘟疫，一次在崇禎十四年，一次在崇禎十六年，其中又以後者傷亡人數最多，也最令人震撼。

崇禎十四年（1641）七月，北京再次爆發嚴重的瘟疫，據云：「死亡者晝夜相繼，闔城驚悼。」面對如此嚴重的疫情，崇禎皇帝曾於會極門召見正一教大真人張應京，命其禳疫。⁴⁵ 其後情況如何，未見談及。不過，明遺民張怡曾經提

³⁹ 《明神宗實錄》卷一八六，萬曆十五年五月辛卯條，頁1a。

⁴⁰ 汪瓚，《名醫類案》（臺北：宏業書局據清刊本影印，1971），卷九，〈疔瘡〉，頁274。

⁴¹ 光緒《嘉定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影印，1991〕第7冊），卷一六，〈人物二〉，頁12a-b。

⁴² 《明神宗實錄》卷四九三，萬曆四十年三月壬寅條，頁4a。

⁴³ 如北京稍南的保定府容城縣，就「人病大頭瘟疫，傳染死者甚眾。」參見光緒《容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22年刊本影印，1969），卷八，〈災異〉，頁2a。

⁴⁴ 《明神宗實錄》卷五五八，萬曆四十五年六月乙巳條，頁5a。

⁴⁵ 《崇禎實錄》卷一四，崇禎十四年七月丁亥條，頁7a。

到：「京軍素多虛冒，自辛巳（崇禎十四年）大飢大疫，繼以逃亡，隸尺籍者十僅一二。」⁴⁶ 可見這一年瘟疫所造成的人口死亡，應該是相當多的。

至於崇禎十六年北京的大疫，疫情之嚴重更是空前。據文秉《烈皇小識》記載：是年「北兵退後，京城瘟疫盛行，朝病夕逝，有全家數十口，一夕併命，人咸惴惴慮其不免」。⁴⁷ 或許這場瘟疫與軍事活動有某種關連。清兵此次入關，在崇禎十五年（1642）歲末。十五年十一月初，清兵由黃崖口破關而入，屢破畿東城邑，其後轉而南下，連下直隸南部州縣，閏十一月已直抵臨清；至十二月，兵鋒甚至達淮北海州、徐州等地，此後轉戰於山東全境。崇禎十六年（1643）三月，清兵自山東北還，繞經通州，京師一度緊張，最後於五月初一由直隸懷柔出關。⁴⁸ 文秉所云的「北兵退後」，指的應是清兵於崇禎十六年自南北退之後，也就是五月以後。

北京這一年的大疫，疫情極其嚴重，而且疫死的人相當多。據《崇禎實錄》記載，是年二月至七月，「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⁴⁹ 當時任錦衣衛指揮的王世德也說：四月以後，「日死萬餘人，城門壅擁，千棺不能出」。⁵⁰ 左都御史李邦華（1574-1644）亦云：「入秋以來，氣候不齊，以致疫癘大作，轉相傳染，閭閻下戶，畢命此中者，一家數口，甚至無遺育，情可惻也。」⁵¹ 又據記述：該年「秋七月，京師大疫，日死人不可勝計，甚有空一門、空一巷者」。⁵² 八月，思宗還因刑部獄中的監犯罹患瘟疫，「物故者多，慘不忍見」，諭命尚書張忻將其取保放出。⁵³ 至九月間，思宗還曾以「憫都人疫，諭修省、釋輕繫」。⁵⁴ 清

⁴⁶ 張怡，《謏聞續筆》（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22編第8冊〔臺北：新興書局，1978〕），卷一，頁2b。

⁴⁷ 文秉，《烈皇小識》（上海：神州國光社排印本，1947），卷八，頁217。

⁴⁸ 參見孫文良、李治亭、邱蓮梅，《明清戰爭史略》（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頁372-375。

⁴⁹ 《崇禎實錄》卷一六，崇禎十六年七月庚申條，頁13a。

⁵⁰ 王世德，《崇禎遺錄》（收入《明史資料叢刊》第五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18。

⁵¹ 李邦華，《李忠肅公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81冊），卷六，〈奏報領銀施棺疏〉，頁87b。

⁵² 金鉉，《金忠節公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陸輯第26冊），卷八，〈年譜〉，頁13a。

⁵³ 李遜之，《三朝野記》（收入《荊駝逸史》〔《明清史料彙編》三集，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8〕），卷七，〈崇禎〉，頁41a-b。

初，宋起鳳在回憶這場大瘟疫時云：

是歲，遍北京城內外，傳染疙瘩瘟一疫，古今方書所無。……一人感之，全家以次傳患，甚者有閨門皆歿，無有棺殮者。親戚不敢弔問，及門必中疫，殆返則家口得全者什不二、三。九門日出萬棺，塗行者悉垂首尫羸，淹淹欲絕。⁵⁵

而據熊開元 (1599-1676) 記述，崇禎十六年七、八月北京瘟疫，「彌月間，官民數十萬，皆須與畢命」。⁵⁶ 又據《花村談往》記載：是年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傳染疙瘩病，「沿街小戶，收掩十之五、六；凡楔杆之下更甚，街坊閒的兒爲之絕影。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已二十餘萬」。⁵⁷ 按此記載，北京在八至十這三個月內，內城九門門吏統計的死亡人數已達二十多萬人。如果這個數字是正確的，那北京在這三個月內所疫死的人口，約是整個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⁵⁸ 堪稱是一場超級大瘟疫。

綜合以上的記載，此次瘟疫可能在二月間已經開始蔓延，但在四、五月以後趨於嚴重，七至十月達到高峰。而據許多資料記述，當年肆虐北京的瘟疫係疙瘩瘟。有記載說這年的疙瘩瘟出現在五、六月間，⁵⁹ 實際上可能更早。這年年底抵達北京的劉尚友則說：「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⁶⁰ 可以想見當時罹患此疫者不在少數。又據《花村談往》記載：

⁵⁴ 《崇禎實錄》卷一六，崇禎十六年九月壬辰條，頁14b。

⁵⁵ 宋起鳳，《稗說》（收入《明史資料叢刊》第二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卷二，「明末災異」條，頁49。

⁵⁶ 熊開元，《魚山剩稿》（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40編第4冊〔臺北：新興書局，1986〕），卷四，〈自序·罪狀本末〉，頁20b。

⁵⁷ 花村看行侍者，《花村談往》（收入《說鈴》〔臺北：新興書局影印，1968〕），「風雷疫癘」條，頁37a-38a。

⁵⁸ 據研究，明代後期北京的人口在八十萬以上，十七世紀時可能已達一百萬。參見 Joanne Clare Wakeland,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 in Ming China: Sixteenth Century Peking*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2), pp. 91-101；新宮學，〈明代的首都北京の都市人口について〉，《山形大學史學論集》11(1994)：36-39；韓光輝，《北京歷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104-110。

⁵⁹ 趙某，《唐亭雜記》（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38編第9冊〔臺北：新興書局，1985〕），頁5a。

⁶⁰ 劉尚友，《定思小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5），頁65。

癸未（崇禎十六年）京師疫時，病起必有紅點在背，中包羊毛一縷，無得活者，疫死至數百萬。⁶¹

由是看來，疙瘩瘟患者身上存有與羊毛瘟相似的病徵。另外，北京在這年冬天又出現了吐血瘟。根據記載：這年的十一月，北京突然流行吐血瘟，病者「人忽咳血一口，週日亦死」。⁶² 另一資料則說：十七年春間，「又有嘔血瘟，亦半日死，或一家數人並死」。⁶³ 雖然時間有所不同，但可知吐血瘟出現在寒冷的冬季與春天。

由於當時的疫情頗惡，故凡客游、宦游京師者，「無不預寫家書，恐不及作囑語。大內亦然」。⁶⁴ 范景文（1587-1644）在家書中就說：「相別曾幾何時，京師瘟疫盛行，哭聲連屋」，而他自己也感染了重病。⁶⁵ 吳麟徵（1593-1644）於家書中亦云：「京師疫病盛行，錢義、王隆相繼物故，三立僅免，我亦多病，思歸甚急，進退兩難，奈何！奈何！」⁶⁶ 另外，在這場瘟疫流行時，申涵光（1619-1677）適入都探視其父親申佳胤（1603-1644），佳胤「遽命肩輿歸」，⁶⁷ 顯然是怕他染上瘟疫。

在這種瘟疫到處蔓延的情況下，居民的恐慌是可以理解的。由於對瘟疫的起因無從捉摸，於其蔓延亦無法掌控，各種謠言於是在城中大肆流傳。其中，民間對於瘟疫的起因，即充滿神祕性的解釋，說這年春天瘟疫未流行前，喪門神曾假扮成一位婦人，穿著白色的衣服，於夜間出來散布瘟疫：

相傳是年春，京營巡捕軍夜宿棋盤街之西，更定時，一老人囑曰：「今夜子時，有一婦人通身縞素，涕泣而至，自西徂東。汝切不可放過，如放過，為害不淺。延至雞鳴，即無事矣。吾乃本境神祇，特來救此一方民，汝違吾言，當得重譴。」迨夜將半，果有一婦白衣泣訴，云歸母家，不意夫死，急欲奔喪，不避昏暮。邏者謹如前戒，堅持不允，婦亦暫退。迄漏

⁶¹ 花村看行侍者，《花村談往》，「風雷疫癘」條，頁39a。

⁶² 趙某，《唐亭雜記》，頁5a。

⁶³ 劉尚友，《定思小紀》，頁65。

⁶⁴ 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4），卷一九，〈崇禎十六年癸未〉，「誌異」條，頁403。

⁶⁵ 范景文，《文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5冊），卷一二，頁22a。

⁶⁶ 吳麟徵，《吳忠節公遺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81冊），卷三，〈家書〉，頁53a。

⁶⁷ 申涵光，《鹿盟先生年譜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7冊），崇禎十六年癸未，頁4b。

五下，邇者偶倦寐，俄頃，婦折而東矣。輒復旋返，蹴邇者醒而告之曰：「吾乃喪門神也，上帝令吾行罰，災此一方，汝何聽老人之言，阻吾去路？汝今逆天，災首及汝！」言畢不見。邇者大懼，奔歸告其家人，言甫終，仆地而死。自後遂有疔疽瘡、西瓜瘡、探頭瘡等症，死亡不可勝計。⁶⁸另外又有記載提到：崇禎十六年四月初一，思宗循例祭享太廟，聖駕未出，中極殿忽起旋風，有白衣人隨風而出，宿衛的軍校皆大驚失色。風吹向東南，白衣人行至大通橋二閘而止。自此瘟疫流行，日死萬餘人。黃昏時，街衢人鬼相雜，遇著白衣者必死。⁶⁹據說當時「貢院前後，人鬼錯雜，日暮人不敢行」。⁷⁰市肆鬻賣餅餌之所，至夜晚檢整櫃錢，半皆冥紙。白晝人鬼相雜不能辨，諸家邸店多貯水於巨盎中，客人所付的錢即丟置水中，以判別是否為真錢。⁷¹此外，也有鬼買棺的傳言：「東城一匠家鬻棺，有人將錢數千、銀幾錠來買十二具，約于前門某衚衕內某家，于次日送來。其匠果于次日送去，至其家，人都死矣。果有十二人，符其棺之數。亟歸，整昨日所貯銀錢，皆紙錠、紙錢也。」⁷²基於民眾企求逃脫死神招手的心理，甚至出現了「區致遠能治疫鬼」的說法：

都事名致遠，新會人，舉于鄉，明末為都察院都事。都下大疫，惟區家晏然。有得其花押者，持至門，室內病人立起。家家走求，於是都事門熱于要津。自官府大僚，牀竈衙署，皆都事花押矣。某御史病甚，過致遠，致遠曰：「入吾榻臥當瘳也。」其人少睡，得汗，病遂已。⁷³

區致遠是否真能治疫鬼，現已難查考，但從上自達官顯要，下至一般百姓，皆前往乞求花押，可以想見當時人群之不安。而且，也就因為當時人們認為瘟疫是疫鬼作祟，故在瘟疫大作時，「民間終夜擊銅鐵器，以驅厲祟，聲達九重，上不能禁」。⁷⁴

⁶⁸ 見胡介祉，《茨村詠史新樂府》（《四庫未收書輯刊》捌輯第26冊），卷下，〈京師疫〉，頁7a-b。並見沈頤仙，《遺事瑣談》（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據清鈔本影印，1976），卷三，〈災異〉，頁112-113。

⁶⁹ 王世德，《崇禎遺錄》，頁18。

⁷⁰ 沈頤仙，《遺事瑣談》卷三，〈災異〉，頁113。

⁷¹ 宋起鳳，《稗說》卷二，「明末災異」條，頁49。

⁷² 趙某，《唐亭雜記》，頁5a-b。

⁷³ 羅天尺，《五山志林》（《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卷二，「能治疫鬼」條，頁25。

⁷⁴ 李遜之，《三朝野記》卷七，〈崇禎〉，頁41b。並見胡介祉，《茨村詠史新樂府》卷

二、瘟疫流行的背景

明代北京瘟疫的時間分布，主要集中在帝國最後一百年，這一點相當值得注意。事實上，這與北直隸的瘟疫發生頻率是相仿的。據個人初步統計，北直隸在明前期（1368-1464）的疫癘甚少，到明中期（1465-1560）的後半始見增加，迨明後期（1561-1644）則增長的情況更加明顯。這三個時期受到瘟疫波及的府州數字，分別為4：33：64。基本上，在一五四〇年以後，直隸的瘟疫也是越來越多。⁷⁵ 換言之，晚明一百年間，華北的病菌似要比以前活躍。

明代北京歷次瘟疫年月分布表

| 季節 | | 春季 | | | 夏季 | | | 秋季 | | | 冬季 | | |
|-------|------|----|----|----|----|----|----|----|----|----|-----|-----|-----|
| |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 成化 7年 | 1471 | | | | ● | ● | | | | | | | |
| 弘治11年 | 1498 | | | | | ● | | | | | | | |
| 嘉靖21年 | 1542 | | | | | ● | ● | | | | | | |
| 嘉靖24年 | 1545 | ● | | | | | | | | | | | |
| 嘉靖33年 | 1554 | | | | ● | | | | | | | | |
| 嘉靖40年 | 1561 | | ● | | | | | | | | | | |
| 嘉靖42年 | 1563 | | | | | ● | | | | | | | |
| 嘉靖44年 | 1565 | ● | | | | | | | | | | | |
| 萬曆10年 | 1582 | | | ● | ● | ● | | | | | | | |
| 萬曆15年 | 1587 | | | | | ● | | | | | | | |
| 萬曆36年 | 1608 | | | | | | | | | | | | |
| 萬曆40年 | 1612 | | | ● | | | | | | | | | |
| 萬曆45年 | 1617 | | | | | | ● | | | | | | |
| 崇禎14年 | 1641 | | | | | | | ● | | | | | |
| 崇禎16年 | 16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京師疫〉，頁7a。類似記載又見于敏行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3），卷一六〇，〈雜綴〉，頁2570。

⁷⁵ 邱仲麟，〈明代的疫癘——兼及官民的肆應〉，頁3。

如上表所示，北京這十五次重大的瘟疫，除了季節不明的萬曆三十六年，與最後兩次之外，主要發生在前半年，即陰曆的春夏二季。其中，又以三月至七月（約為陽曆的四至八月）的發生頻率最高。不過，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由於在這十餘次瘟疫當中，除崇禎十六年的記載較為完整外，其餘的十三次瘟疫，通常僅記其疫情嚴重的月份，至於何時出現、何時消失，記載多半闕如。因此，此表所呈現的，僅是嚴重疫情的月份分布，不足以代表該年的流行情況。至於歷次瘟疫的大小，除了崇禎十六年瘟疫的嚴重性可能高於其它幾次之外，對於其它的十餘次，基本上很難分辨其高下。

然而，為何北直隸的瘟疫主要發生在一五四〇年以後？氣候的轉冷，或許是可能的因素之一。根據學者的研究，明代後期天氣轉趨寒冷，熱帶地區自十六世紀開始出現降雪現象，至十七世紀最冷。⁷⁶ 又根據文煥然的研究，華北在一四五〇年以後，寒冷年份明顯增多；而一五五〇至一六五〇年這一百年間，氣候又較一四五〇至一五五〇年間為冷。⁷⁷ 以海河流域來看，明中葉自一五〇〇年以後，冷秋、冷冬、冷春、冷夏的年份計有54年，平均約2.7年就會遇到一次冷年。⁷⁸ 這樣看來，氣候轉冷與瘟疫流行之間，似乎有某程度的重疊，然而這當中缺乏足夠的證據，本文不擬多加討論。

不過，北京歷次瘟疫與災荒的關連性相當密切，倒是可以確定的。據于德源指出：明代北京的瘟疫，大多出現在水、旱災和饑荒之後。嘉靖三十三年春，京畿因上一年北直隸大水，饑荒嚴重，百姓甚至剝樹皮以食，延至該年四月，都城內外發生大疫。另外，嘉靖四十四年的瘟疫，亦與饑旱有關。至於萬曆年間的瘟疫，發生瘟疫的時間也均在該年的饑旱月份：萬曆十年發生在三月，十五年也發生在「天時亢陽」的五月，四十五年發生在「赤日流金，土焦泉涸」的六月；而崇禎十四年以後連續四年的大旱，也為崇禎末年的瘟疫，創造了有利條件。⁷⁹ 明

⁷⁶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竺可楨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頁486-487。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上冊，頁220-221。張丕遠主編，《中國歷史氣候變化》（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頁303-304。

⁷⁷ 文煥然、文榕生，《中國歷史時期冬半年氣候冷暖變遷》（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頁122-129, 161。

⁷⁸ 湯仲鑫等編著，《海河流域旱澇冷暖史料分析》（北京：氣象出版社，1990），頁111-112。

⁷⁹ 于德源，《北京農業經濟史》，頁251-253。

代北京的許多次瘟疫，就與附近災荒之區饑民的湧入有所關連。

而在另一方面，北京以其政治上的樞紐地位，即使沒有饑民湧至，其通往全國各地的交通線，也不可避免地成爲瘟疫傳播的通道。在明代，由北京向外輻射的官道與驛路計有七條，分別通往東邊的山海關、東北邊的古北口、西北邊的宣府鎮、西邊的大同鎮；西南趨保定，轉南可經河洛至湖廣，再達雲貴或兩廣；東南往天津，循運河趨齊魯，直抵蘇杭，轉至閩贛。⁸⁰ 在此情況下，即使附近未發生饑饉，只要瘟疫在北直隸或其它地方爆發，透過官員、商人等人群的南來北往，同樣可以將瘟疫的病菌帶至北京。反之，北京一旦遭受瘟疫侵襲，其病菌也會經由北京往各地擴散。當然，北京的瘟疫也有可能是自發的。但由於資料缺乏，我們很難判斷北京在瘟疫的傳播上是否曾扮演過疫源地的角色。

除了以上這些背景之外，環境衛生的因素，可能也必須加以考慮。⁸¹ 在中國，其實很早就認識到環境衛生不佳易於滋生疾病。以宋代而言，就不乏這類的看法。⁸² 這種認識，在明代同樣存在。萬曆中葉，謝肇淛（福建長樂人，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旅居北京時，曾對京師的生活環境有如下的評述：

京師住宅既偏窄無餘地，市上又多糞穢，五方之人，繁囂雜處，又多蠅蚋，每至炎暑，幾不聊生，稍霖雨，既有浸灌之患，故瘧痢瘟疫，相仍不絕。攝生者，惟靜坐簡出，足以當之。⁸³

雖然整段文字缺乏緊密的邏輯性聯繫，但謝氏在此很清楚的點出：明代後期北京城市環境的不佳，與瘟疫不斷發生有所關連。從行文當中可以知道當時的北京，有著居住空間狹窄、街道髒亂、排水不良，又多蚊蠅的問題。也就因爲如此，乃

⁸⁰ 有關於北京往各地的交通線，參見蘇同炳，《明代驛遞制度》（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9），卷首，「明代全國驛路圖」；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109，「二京至十三布政司主要驛路圖」。

⁸¹ 按照現代公共衛生學的看法，環境衛生的不佳，與瘟疫的流行，存在著極大的相關性。參見經利彬、張文彬編著，《衛生學》（臺北：正中書局，1953），頁23-25。另參見孟洛（W. B. Munro）著，宋介譯，《市政原理與方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頁135-167。

⁸² 鄭壽彭，《宋代開封府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0），頁570；梁庚堯，〈南宋城市的公共衛生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0.1(1999)：128-139。

⁸³ 謝肇淛，《五雜俎》（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影標點本，1977），卷二，〈天部二〉，頁33-34。

使得「瘡痍瘟疫，相仍不絕」。不過，即使謝肇淛已經指出這點，但北京歷次的大瘟疫，是否與這些因素存在直接的關聯，已經難以查考，故以下有關於北京環境衛生的考察，僅在於指出明代中後期北京環境衛生的變遷，以及公共衛生的管理日趨敗壞，可能與瘟疫的增多有某種程度的關係。

明代對於京城街道、溝渠的清潔，設有專責衙門管理與監督。明初，負責巡視北京道路、溝渠的機構，為錦衣衛官校、五城兵馬司、巡街御史；至成化十五年（1479），工部虞衡司也成為巡視街道的衙門之一。據資料記載，工部虞衡司之下設有街道廳、街道房，專責整頓街道。⁸⁴ 另外，對於在街道上傾倒穢物，律令同樣有所限制。明初在定律令時，曾斟酌《唐律》、《宋刑統》的條文，⁸⁵ 對於街道有如下的規定：

凡侵占街巷道路，而起蓋房屋，及為園圃者，杖六十。各令復舊。其穿牆而出穢污之物於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論。⁸⁶

這一規定除了不准起蓋違章建築、侵占路面之外，也不准將污穢之物棄置於街道之上，至於向街上潑水，則不處罰。不過，雖然有以上的法規與這些巡視的機構，但都市居民的生活習慣與管理機關的因循苟且，遂使得都市的環境衛生日益惡化。從諸多記載看來，謝肇淛所談到的這些問題，並非是萬曆年間才出現的。至晚在十五世紀後半，這些問題已經在北京浮現。

實際上，城市人口的增長，也對北京的環境衛生帶來負面的影響。明代初期，北京城內的居住空間尚未飽和，衛生條件應也較好。在這段期間，北京未爆發嚴重的疫情，或許與此有關。然而，在十五世紀中葉以後，北京人口日益增加，其居住品質相對下降。成化五年（1469），吳寬曾說：「京師民數歲滋，地一

⁸⁴ 李東陽等，正德《大明會典》（東京：汲古書院影正德四年司禮監刊本，1989），卷一五九，〈橋道〉，頁21b, 22a。沈榜，《宛署雜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0），卷五，〈德字·街道〉，頁34。

⁸⁵ 《唐律》、《宋刑統》中的條文為：「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種植墾食者，笞五十。各令復故。雖種植，無所妨廢者，不坐。其穿垣出穢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論。主司不禁，與同罪。」參見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3），卷二六，〈雜律〉，頁488-489。竇儀，《宋刑統》（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4），卷二六，〈雜律〉，頁417。

⁸⁶ 黃彰健編著，《明代律例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卷三〇，〈工律二·河防〉，「侵占街道」條，頁1024。

畝率居什佰家，往往床案相依，庖廁相接，其室宇湫隘，至不能伸首出氣。」⁸⁷ 弘治二年（1489），也曾說當時北京是「生齒益繁，物貨益滿，坊市人蹟，殆無所容」。⁸⁸ 京城的居住空間，似乎已極擁擠。至明代後期，城內及關廂的人口增至八十萬以上，居住空間狹小的問題，當更為嚴重。而隨著人口的增加，各種垃圾、穢物的處理，也成爲一個大問題。

垃圾堆積

北京居民作賤街道的問題，在十五、十六世紀之交已經相當嚴重。弘治六年（1493），兵部尚書馬文升（1426-1510）的奏疏就談到：皇城北安、東安、西安各門外，「被人作踐，十分不潔」。⁸⁹ 直至萬曆初年，皇城一帶仍然不怎麼乾淨。萬曆七年（1579），神宗曾降旨：「潔淨皇城門，并疏通溝渠、道路。」⁹⁰ 而萬曆十年（1582），工部申明街道事宜六款時，其中二款也提及潔淨皇城四門、灑掃街道溝渠之事。⁹¹ 皇城宮門附近尚且如此，其它街道可知。

此外，由於居民將灰燼、碎屑等物傾倒於街面，日積月累，往往導致街面上升，高過兩旁住家，連帶也造成住家積水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明孝宗在位時已經存在。弘治六年，馬文升上奏時也談到：皇城北安、東安、西安三門外，「三面糞土，高於門基，若遇大雨，水必內流，恐與門基相平」。而另一方面，「東西長安門外通水溝渠，年久淤塞，水不能行」。⁹² 直至崇禎末年，還是有官員指出：居民將土屑、煤渣倒棄於馬路上，造成路面升高，兩旁建築物「沒地數尺」，每逢大雨，雨水灌入民居，導致積水不退。⁹³

⁸⁷ 吳寬，《家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5冊），卷三一，〈陋清閣記〉，頁5a。

⁸⁸ 吳寬，《家藏集》卷四五，〈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閔公七十壽詩序〉，頁13b。

⁸⁹ 馬文升，《端肅奏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27冊），卷五，〈潔淨皇城門禁以壯國威事〉，頁3a。

⁹⁰ 《明神宗實錄》卷八五，萬曆七年三月丁未條，頁2b。

⁹¹ 《明神宗實錄》卷一三〇，萬曆十年十一月戊辰條，頁5b。

⁹² 馬文升，《端肅奏議》卷五，〈潔淨皇城門禁以壯國威事〉，頁3a-4a。

⁹³ 李邦華，《李忠肅公集》卷六，〈巡城約議疏〉，頁56a。

排水不良

北京在建都之初，原有良好的排水設計，此一設計直至民初猶爲人所稱道。⁹⁴不過，北京自永樂年間（1403-1424）興築以來，由於歷時久遠，溝渠淤積的問題日趨嚴重。景泰六年（1455），官方曾命給事中、監察御史、工部官，督率五城兵馬司疏濬京城溝渠。⁹⁵然而至成化年間，淤塞問題依然存在。這種情況在皇城附近，亦是如此。成化二年（1466），就曾疏通皇城東、西公生門至大明門溝渠215丈，以及東安門至南牆角溝渠225丈。⁹⁶同年，憲宗並下令：「京城街道、溝渠，錦衣衛官校，并五城兵馬，時常巡視，禁治作踐，如有怠慢，許巡街御史，參奏拏問。若御史不言，一體治罪。」⁹⁷成化六年（1470），又令：「皇城周圍，及東西長安街，並京城內外大小街道、溝渠，不許官民人等，作踐掘坑，及侵占、淤塞。」⁹⁸然而，溝渠淤積的問題並未解決，對於這類情況的指謫，也屢屢形諸官員的奏疏。⁹⁹成化八年（1472）十月，御史楊守隨等人在上奏時，甚至建議「令居民自治溝渠」。¹⁰⁰至成化十年（1474）四月，由於城中「街渠汙穢壅塞」，憲宗至爲震怒，曾降旨將中城兵馬司指揮、巡城御史及錦衣衛官校下獄，令法司議罪。¹⁰¹從朝廷一再頒布這些命令及官員的奏陳看來，問題似乎已到不得不加以解決的地步。爲了能根本性解決這一問題，工部在成化十年奏准：

京城水關去處，每座蓋火鋪一，立通水器，於該衙門撥軍二名看守，遇雨過，即令打撈。其各廠大小溝渠、水塘、河漕，每年二月，令地方兵馬，通行疏濬。看廠官員，不得阻擋。¹⁰²

此一條例大致可分兩方面來看，其一係於各重要的水關，蓋鋪舍一間，設置通水

⁹⁴ 齊如山，《故都三百六十行》（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御史查溝」條，頁77-78。

⁹⁵ 《明英宗實錄》卷二五五，景泰六年閏六月癸酉條，頁7a。

⁹⁶ 《明憲宗實錄》卷三一，成化二年六月戊午條，頁7a-b。

⁹⁷ 李東陽等，正德《大明會典》卷一五九，〈橋道〉，頁21b。

⁹⁸ 李東陽等，正德《大明會典》卷一五九，〈橋道〉，頁21b。

⁹⁹ 《明憲宗實錄》卷一〇〇，成化八年正月戊午條，頁9a；卷一二七，成化十年六月戊寅條，頁4b-5a。

¹⁰⁰ 《明憲宗實錄》卷一〇九，成化八年十月丁亥條，頁4b-5a。

¹⁰¹ 《明憲宗實錄》卷一二七，成化十年四月丁丑條，頁8a。

¹⁰² 李東陽等，正德《大明會典》卷一五九，〈橋道〉，頁22a。

工具，派軍士二名看守，大雨過後，即令打撈河上的垃圾。其二則是每年二月，京城所有的溝渠、水塘及河道，通行疏淘，此即明人所謂的二月淘溝之制。後來，淘溝制度實施至萬曆七年（1579）三月，因神宗降旨：「潔淨皇城門，并疏通溝渠、道路，歲爲例」，¹⁰³才改爲三月淘溝。然而，溝渠淤塞的問題，直至晚明仍然未有大幅度的改善。萬曆三十六年（1608），工部都給事中孫善繼就曾奏陳：「國家宮府、市廛、溝渠、街道，靡不昉古，經緯布之。年來職掌寢廢，街道穢積，所在爲丘；溝渠壅塞，一雨成沼。」¹⁰⁴

滿街糞穢

除了以上兩者之外，北京還有一個長年以來無法解決的問題，即滿街是糞穢。究其所由，也與居民的生活習慣有關。王思任（1576-1646）在《謔菴文飯小品》中就曾說：「愁京邸街巷作溷，每味爽而攬衣。不難隨地宴享，報苦無處起居。」¹⁰⁵這種在街巷上隨地便溺的情況，應是相當普遍。清初，李鶴林在《集異新抄》中曾有一則紀事云：

吳門馮先生謁選京師，謂人言：「長安道中有二恨：遍地烏紗、觸鼻糞穢。獨我窮經一生，巴一頂教官紗帽，候缺年餘，未得到手，不若猾胥市儈，朝謀而夕榮，一恨也。偶從道旁疴尿，方解禪，卒遇貴官來，前驅訶逐至兩、三衢衙，幾汗禪內，二恨也。」聞者絕倒。¹⁰⁶

此一記載，談到這位馮先生在北京想求頂烏紗帽戴，候缺多年未得，本想在路邊拉屎，沒想到遇見高官經過，前面開道的左驅右趕，趕到兩、三條衢衙之外，害得他差點痾在褲子裏，又想到自己沒得官做，所以如此狼狽，自然是恨了！

而居民之所以隨地大小便，則與北京的廁所少有所關連。在明代的北京，室內設有廁所者不多，其中最好的當推紫禁城。據記載：「乾清宮圍牆之內，左右廊房之朝南半間者，曰東夾牆、西夾牆，又慈寧宮西第等處，皆宮眷、內官便溺

¹⁰³ 《明神宗實錄》卷八五，萬曆七年三月丁未條，頁1b。

¹⁰⁴ 《明神宗實錄》卷四四七，萬曆三十六年六月甲戌條，頁3b。

¹⁰⁵ 王思任，《謔菴文飯小品》（《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00〕第1368冊），卷一，〈坑廁賦〉，頁93b-94a。

¹⁰⁶ 李鶴林，《集異新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32編第8冊，臺北：新興書局，1981），卷三，「長安二恨」條，頁15a。

之所。宮牆之外，磚砌券門，安大石於上，鑿懸孔垂之，各有淨軍在下接盛。」每月的初四、十四、二十四三日，開玄武門及各小門放夫匠及打掃淨軍，入內擡運堆積的糞穢。¹⁰⁷ 擡運時，「以空車推入一換，從後宰門出」。¹⁰⁸ 另外，在慈寧宮南邊的司禮監掌管處，亦設有茅房、木桶，「爲便溺之所」。¹⁰⁹

至於皇宮之外，家中設有廁所的，多半是達官貴人。成化年間（1465-1487）有位書生來到北京，就看準廁所需要有人清理這點，與其妻子商量說：「京師甲第連甍，高者翬飛，低者鱗次，皆有偃舍其中。吾顧無他能，將求治溷以爲業，不識可乎？」其妻不置可否，書生乃「置澣器二、舂一，恒冠幘曳履，負器荷舂，日往富貴者之門，爲之治溷，治溷一輒取錢數文，人見其巾幘類儒生也，因呼爲『治溷生』」。¹¹⁰ 由此記載看來，北京貴戚之家多有偃廁，這位書生爲這些家庭清理糞穢，每次才得數文錢，看來工資頗賤。

然而，雖說達官貴人多有偃廁，但一般人家則多無此設施。明末，謝肇淛曾在《五雜俎》中提到：大江以北人家，家中大多不設偃廁，而以「淨器之便」爲主；至於京師，「則停溝中，俟春而後發之，暴日中，其穢氣不可近，人暴觸之輒病」。¹¹¹ 由此看來，北京城內一般住家或多不設偃廁，而以淨桶替代。結果，淨桶中的屎尿，都倒入了溝渠之中，造成了嚴重的環境衛生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溝渠是臭氣沖天。萬曆初，徐渭（1521-1593）在詩中就曾詠道：「燕京百事且休憂，但苦炎天道上溝。近日已聞將掃括，不須遮鼻過風頭。」¹¹²

其實，明代北京的街道上除了人糞之外，牲畜的排泄物也到處是。萬曆年間，屠隆（1542-1605）就曾說：「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淖濘沒鞍膝。」¹¹³ 這

¹⁰⁷ 劉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94），卷一六，〈內府衙門職掌〉，頁106；卷一七，〈大內規制紀略〉，頁148。

¹⁰⁸ 徐充，《暖姝由筆》（《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第213冊），頁6b。

¹⁰⁹ 劉若愚，《酌中志》卷一七，〈大內規制紀略〉，頁149。

¹¹⁰ 童軒，〈治溷生傳〉，收入黃宗義編，《明文海》（北京：中華書局影清抄本，1987），卷四二四，頁7b-8a。

¹¹¹ 謝肇淛，《五雜俎》卷三，〈地部一〉，頁76。

¹¹² 徐渭，《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3），《徐文長三集》卷一一，〈燕京五月歌四首〉，頁357。

¹¹³ 屠隆，〈在京與友人〉，見何偉然等評選，《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78冊），卷二，《翠娛閣評選屠赤水小品》，頁11a。

種情況，謝肇淛也有一番體會。他說：「燕都高燥多煩暑，五、六月則赫曦蘊隆，自旦徹夜，九衢之交，驢馬輿僮，肩磨踵擊，污潢糞穢，逆鼻不可耐。」¹¹⁴崇禎年間，京官們也有「朝罷驢屎攜滿袖」之說。¹¹⁵甚至有人曾戲謔地說：

京師有七味解熱丸，用騾驢人馬牛犬豕糞，以大騾車羅過，加久年陰溝秋實和之，此丸專解爭名爭利的熱火。¹¹⁶

這雖是戲謔之語，但卻點出了北京街上的各種糞穢，如騾糞、驢糞、人屎、馬糞、牛糞、犬屎、豬屎等等。想來明代後期北京的街上，到處是糞便，其臭自然令人難以忍受。難怪明末李流芳（1575-1629）會說：「長安城中有何好，惟有十丈西風塵。人畜糞土相和勻，此物由來無世情。」¹¹⁷

病媒滋生

明代後期北京這樣的都市環境，其實頗利於傳染病媒的生長。明中葉，何孟春（1474-1536）曾云：「京城夏月蚊多，處人苦於宵嚼，百計薰逐，不能成寐。」¹¹⁸何景明（1483-1521）亦有詩云：「晝夜蚊蠅飛滿天，穿牕撲帳攪人眠。」¹¹⁹謝肇淛更是一再指出「京師多蠅」。¹²⁰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曾抱怨說：

（京師）四月以後，即苦暴暑，斗室如爨，床几皆難著手。袒跣偃臥，則青蠅踴之不置，青衣平頭，塵箒交揮，纔得合睫，復聞剝啄聲。¹²¹

其實，北京多蠅，並不是謝肇淛一個人的感受而已，其它士人也多語及。俞彥（萬曆二十九年〔1601〕進士）就曾痛斥北京的蒼蠅：「十萬八千隨處是，噴頭

¹¹⁴ 謝肇淛，《小草齋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6冊），卷一〇，〈蓮華庵記〉，頁20a。

¹¹⁵ 其原因在於：「京師脚驢，多於沙塵中遺尿，既乾經踐，仍復成塵，乘風而起，穢氣逆鼻，所謂『驢屎攜滿袖』也。」見楊士聰，《玉堂簪記》（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影抄本，1977），頁67-68。

¹¹⁶ 姚旅，《露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1冊），卷一二，〈諧篇〉，頁11b。

¹¹⁷ 李流芳，《檀園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5冊），卷二，〈送汪君彥同項不損燕游兼呈不損〉，頁17a。

¹¹⁸ 何孟春，《餘冬序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01冊），卷五〇，頁7a。

¹¹⁹ 何景明，《大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7冊），卷二九，〈苦熱行十首〉，頁11a。

¹²⁰ 謝肇淛，《五雜俎》卷九，〈物部一〉，頁236。

¹²¹ 謝肇淛，《小草齋文集》卷二一，〈京邸與人雜書〉，頁24a。

嘖耳又呼朋，佛見也須憎！」¹²² 蒼蠅之惱人，由此可見。直至明末，黃道周(1585-1646)仍說：「京師物繁，蒼蠅爲最。」¹²³ 而朱察卿(?-1572)甚至會開玩笑地說：北京的「青蠅屎，日可積十石」。¹²⁴

在明代後期，北京除了多蚊蠅之外，也多床蝨(臭蟲)、跳蚤。嘉靖末年，郎瑛在北京就曾有一番體驗，他說：「予嘗以北京多虱，畏之者以床置室中央，水春戴其足，虱不能至矣，然猶群聚於梁以下。」¹²⁵ 雖然在四支床腳分別放了水春，但虱子還是一樣令人感到可怕！萬曆年間，俞彥談到北京的臭蟲，記憶也是揮之不去：「天地不仁迺生爾，何緣獨聚此城中，夜夜苦相逢！」¹²⁶ 其它如戴九玄(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他也有詩詠道：「長安不可住，五月劇炎暑。日與青蠅居，夜與蚤蝨處。」¹²⁷ 王思任(1576-1646)也曾苦於北京的「蒼蠅竟夜語」與「攬虱隨膚掠」。¹²⁸ 錢謙益(1582-1664)在〈鼈蝨詩〉中，更是細述了其在北京被蝨子騷擾的情況：

僦舍都門外，湫隘類鼠穴。土炕擋前楹，瓴甌累後闥。炎歊氣彌蒸，溝澮惡不潔。凡百蟲與豸，因依作巢窟。有蟲蟻蝨類，厥然肖惟蠶。形圓脊微穹，帶介儼環列。多足巧於緣，利嘴銳如鐵。伏匿床第間，夢嚙伺恍惚。褻肌陷針芒，嗽血恣剝刷。攢嚼方如錐，墳起已成凸。不禁膚爬搔，猛欲手捽滅。倏若捷疾鬼，驚走在一瞥。都無翼撲緣，不聞聲僂屑。近或匿枕衾，遠或走柄橐。明或潛帷幔，隱或據衣袂。遶床何處搜，拂簣誰能撇？兒童偶批擗，經時臭不歇。未足快俘獲，徒然滋嘔噦。我坐環堵室，屏居謝朝謁。方當病幽憂，又復遭螫齧。睡少不耐噴，皮枯豈堪暫。……¹²⁹

¹²² 俞彥，《俞少卿集》(《四庫未收書輯刊》陸輯第23冊)，〈近體樂府〉，頁6a。

¹²³ 見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0)，卷二，〈城東內外·春場〉，頁77。

¹²⁴ 朱察卿，《朱邦憲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5冊)，卷五，〈燕市集序〉，頁15a。

¹²⁵ 郎瑛，《七修類稿》(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卷四五，〈事物類〉，「壁虱」條，頁664。

¹²⁶ 俞彥，《俞少卿集》，〈近體樂府〉，頁6b。

¹²⁷ 戴九玄，〈長安不可住〉，見《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內外·春場〉，頁77。

¹²⁸ 王思任，《王寄重十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7)，〈避園擬存〉，〈熱嘆詩〉，頁365。

¹²⁹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5)，卷八，〈鼈蝨〉，頁241。

由錢謙益這首詩，可以看出其居室是空間狹窄又排水不良。而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蟲子成了他每天晚上睡覺時所要奮戰的對象。

綜合看來，在明代後期，北京的環境衛生是出了問題。而之所以如此，原因或許相當複雜，但與唐、宋兩代相比，明代律令對於違犯街道管理條例者的處罰減輕了很多。就出穢污之物於街巷而言，在宋代杖六十，明代則改為笞四十。而且，《大明律》也缺乏《唐律》、《宋刑統》中「主司不禁，與同罪」的規定。或許也就因為不追究失職者的責任，相關衙門漫不經心，街道衛生也就不太理想。而在定期淘溝方面，相關衙門也常僅是虛應故事，¹³⁰ 故溝渠淤塞的問題也是長期無法解決。然而，有時問題被提出來，官方未必就有強烈的警覺與貫徹的魄力。弘治十六年（1503），吏科左給事中吳世忠在上疏時曾指出：

皇城之外街土太高，於相地為凌犯之象；溝湖日壅，於剋應為腸目之災；臭惡薰蒸，於醫家為嘔痢之疾。乞將濠湖填窄者，盡為開闢；溝渠阻塞者，盡為淘濬；街巷堆積者，盡為鋤艾，乃大街兩旁皆栽植槐柳，以蔭夏日。事下工部，覆奏。命姑置之。¹³¹

吳世忠的這段文字分別談到：皇城外街土太高，就相地之術而言，為下凌上之象；溝渠池塘壅塞不通，於五刑剋應為腸目之災；而道路惡臭薰天，就醫家的看法，將有爆發「嘔痢之疾」的可能。故建議開闢填窄之濠湖、淘濬阻塞之溝渠、鋤艾街巷之堆積，並在大街兩旁廣植槐柳。其建議頗具建設性，可惜遭到擱置。此外，明代北京的街道管理成效不彰，可能也與人力不足有關。由於明代京師街道的修繕，是以徵調差役的方式進行，常僅在道路破壞嚴重的時候，才由各城兵馬司督促夫役修理；¹³² 而平時並未有清道夫之類的組織，對於京師常時性的污穢物處理，並未能取得全盤性的解決。嘉靖六年（1527），大學士桂萼曾建議將京城內無所事事的游手者整編，「授以耒耜畚鍤，因責之以除糞穢，潔街衢，聚土塗，治潦水，埋棄屍，掩流齒」，¹³³ 即由游手者負責清潔街道溝渠的工作，但

¹³⁰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59），卷一九，〈工部〉，「兩京街道」條，頁487。

¹³¹ 《明孝宗實錄》卷二〇三，弘治十六年九月丁卯條，頁4a-b。

¹³²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地理形勢、氣候與都市環境管理：一個人文角度的觀察〉，《史原》18(1991)：76。

¹³³ 桂萼，《文襄公奏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60冊），卷一，〈應制條陳十事疏〉，頁36a-b。

似乎沒有議行。

從某方面來說，北京居民生活習慣不佳與環境衛生管理不善，所導致的環境衛生惡化，對於瘟疫的散播應有影響。據現代微生物學的臨床報告，病菌的散播分為機械性傳播 (mechanical transfer) 及生物性傳播 (biological transfer) 兩類，而昆蟲在後者之中，是重要的傳播媒介。¹³⁴ 明代後期，北京的蒼蠅、跳蚤、壁蝨等昆蟲之大量存在，自然增加了生物性傳播的機會。而環境衛生的惡劣，也為機械性傳染增加了相當大的機率。雖然我們不知道北京在明代是否曾爆發小規模的瘟疫流行，但其存在應是一個可以理解的事實，謝肇淛前面所指陳的「瘧痢瘟疫，相仍不絕」，應該就是這個情況。至於明中葉以後都城環境衛生的不佳和病媒的大量存在，是否與這十五次較大型的瘟疫有絕對的關係，雖然無法證明、也難查考，但這當中亦應有某程度的聯繫。

三、流行瘟疫考論

就前面所統計的十五次瘟疫而言，在萬曆之前，多半未見病名之記載與病狀之描述；而在萬曆以後，這方面的記載則較多，有些資料對於病情的描述也較詳細。就已知病名的幾次瘟疫來說，北京在弘治十一年曾嚴重流行痘疹；而在萬曆以後，至少曾流行過大頭瘟、羊毛瘟、疙瘩瘟及吐血瘟這幾種疫病。其中，大頭瘟流行於萬曆十年 (1582)、萬曆四十年 (1612)；羊毛瘟則發生在萬曆十五年 (1587) 及崇禎十六年 (1643)；至於疙瘩瘟及吐血瘟，則爆發於崇禎十六年。

痘疹，即今日所知的天花，殆已無疑義。至於大頭瘟、羊毛瘟、疙瘩瘟及吐血瘟這幾種瘟疫，由於病名甚奇，而且醫籍中的記載也不如痘疹多，到底是何種傳染病，還是充滿爭議。其實，受限於既有史料對於瘟疫的記載簡略，加上記述語言的迷津不易解開，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傳染病，極容易碰到瓶頸。雖然認定某種瘟疫是現在的何種疾病，是件不討好且易引起爭議的事；¹³⁵ 但個人認為，即

¹³⁴ 機械性傳播包括 (1) 接觸傳染，如接吻、性接觸、皮膚分泌物、病媒排泄物等；(2) 空氣傳染，如飛沫、塵埃傳染；(3) 飲食傳染；(4) 病患及帶菌者使用過的物品傳染。生物性傳播則主要為 (1) 病媒傳染，如跳蚤傳染鼠疫；(2) 動物傳播，如狂犬咬傷人造成狂犬病。參見林榮茂、林環編，《微生物學》(臺北：南山堂出版社，1982)，頁70-71。

¹³⁵ 在西方，有醫學史學者曾對此種對應的考察方式提出批評。Andrew Cunningham 就反對以現代的「鼠疫」概念解釋中世紀的「黑死病」。他認為用現代疾病概念來解釋過去的

使無法直接以細菌檢驗的方式對過去的疾病做出決定性的判定，但只要不是爲了譁眾取寵，或迎合當代流行說法，依據證據進行推論，以提供相關學者論辨，似乎也無不可。基於此，以下將對大頭瘟、羊毛瘟、疙瘩瘟及吐血瘟的病徵加以敘述，並稍做推論。

痘疹

在中國，痘疹的流行史可以上推至西元四、五世紀之間。¹³⁶ 其在明代，也常造成幼兒極大的死傷。¹³⁷ 不過，就個人所見，資料載及北京痘疹大流行，僅言及弘治十一年（1498）。然從明代許多京官的小孩，常因痘疹而死於京師，可以推知痘疹在北京仍不時流行。如王直（1379-1462）就曾說：「予來京師，有男女三人，皆以痘疹失之。」¹³⁸ 又，岳正（1418-1472）的次子應元，亦以痘疹病死於北京，生下來才五個多月。¹³⁹ 另外，夏良勝的女兒進第，在正德七年（1512）陰曆五月三十日，以痘瘡暴卒於北京，死時才四歲。¹⁴⁰ 姚希孟（1579-1636）之子宗明，亦於天啓四年（1624）正月十三日，因痘癰死於北京，年僅三歲。¹⁴¹ 由這些例子看來，痘疹在北京長期存在、且不定時流行，應是可以確定的。直至清

疾病史，帶來的是對過去的醫學與疾病觀的嚴重扭曲；要決定某種疾病是不是鼠疫，只有靠細菌學檢驗與實驗室才能判定。Cunningham 這樣的立場，涉及到一個知識論上的難題，也與疾病生物學史的基本出發點相抵觸，引發了學界的辯論與反對意見。這一看法，並非人人都接受，以研究殖民醫學史著名的 David Arnold，就不排斥以現代疾病範疇來探討現代實驗室醫學到來之前的疾病史，並曾揣測西元一八五〇年代印度發生的 Burdwan Fever，極可能是瘧疾。參見李尚仁，〈歐洲擴張與生態決定論——大衛阿諾論環境史〉，《當代》170(2001)：25。

¹³⁶ 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87），上冊，頁239。

¹³⁷ 邱仲麟，〈明代的疫癘——兼及官民的肆應〉，頁9-10。

¹³⁸ 王直，《抑菴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1-1242冊），後集卷九，〈贈鄒孟義序〉，頁23a。

¹³⁹ 岳正，《類博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6冊），卷九，〈瘞應元兒銘〉，頁9a-10a。

¹⁴⁰ 夏良勝，《東洲初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9冊），卷五，〈女進第壙銘〉，頁9b-10a。

¹⁴¹ 姚希孟，《棘門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78冊），卷四，〈殤兒宗明誌銘〉，頁691-692。

代，痘疹仍常見於北京，造成居民（特別是旗人）極大的困擾。¹⁴²

大頭瘟

大頭瘟這一種疫病，見諸於記載，始於金泰和二年（1202）四月。據《試神方》記載此疫的症狀云：「初憎寒體重，次傳頭面腫盛，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舌乾口燥，俗云大頭天行。」¹⁴³ 爾後，在元明的醫籍中，也都載有此一病名。明末，秦景明在其《症因脈治》（成書於崇禎十四年〔1641〕）中曾說：「大頭症，古書未載，近代獨多。頭面紅腫，其大如斗。」¹⁴⁴ 其所言應即指此疫在明代曾頻頻流行。然而，此疫在明中葉以前的流行情況如何，則不甚清楚，直至萬曆年間（1573-1620）始大量見諸於記載，北京流行大頭瘟，也多在萬曆年間（萬曆十年及四十年）。

明代關於大頭瘟病徵的描述，雖然稱不上細緻，但還是值得稍做討論。據康熙《懷來縣志》記載，感染此疫者，「人腫頸，一二日即死」。¹⁴⁵ 又據龔廷賢（1522-1619）於萬曆十四年在開封所目擊，述其症狀云：

萬曆丙戌（十四年）春，余寓大梁，府屬瘟疫大作，士民多斃其症，閭巷相染，甚至滅門。其症頭疫身痛，憎寒壯熱、頭面頸項赤腫、咽喉腫痛、昏憤等症，此乃冬應寒而反熱，人受不正之氣，至春發瘟疫，至夏發為熱病，名曰大頭瘟，大熱之症也。¹⁴⁶

而張介賓（1563-1640）在《景岳全書》（成於天啓四年〔1624〕）中，記大頭瘟的症狀為：「憎寒發熱，頭目頸項或咽喉俱腫，甚至腮面紅赤、肩背斑腫，狀如蝦蟆，故又名蝦蟆瘟。」¹⁴⁷ 又云：「其證則咽痛、項腫，甚有頸面、頭項俱腫

¹⁴² 可參見前引梁其姿、張嘉鳳所撰各文。

¹⁴³ 見載於朱橚，《普濟方》（《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47-761冊），卷一五一，頁69a。

¹⁴⁴ 秦景明，《症因脈治》（臺北：旋風出版社，1972），卷一，〈內傷·頭痛附大頭症〉，頁69。

¹⁴⁵ 康熙《懷來縣志》卷二，〈災異〉，頁16b。

¹⁴⁶ 龔廷賢，《萬病回春》（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點校本，1993），卷二，〈瘟疫〉，頁99。

¹⁴⁷ 張介賓，《景岳全書》（上海：上海科學出版社影印，1959），上冊，卷一三，〈雜證謨·瘟疫〉，頁233。

者。北方尤多此病，俗人呼為蝦蟆瘟，又名顛驚瘟，亦名大頭瘟。」¹⁴⁸ 不過，有不少明末清初的醫者，認為大頭瘟與蝦蟆瘟是有所區別的，如王肯堂（1549-1613）在《證治準繩》中，就認為兩者有所不同，其「發頭面預腫」者，是大頭瘟；而「腮頰預腫者」，才是蝦蟆瘟。¹⁴⁹ 清初，吳有性（約1582-1652）及喻昌（1585-1664?）也都認為兩者是有分別的。吳有性在《瘟疫論》中云：「其為病也，或時眾人發頰，或時眾人頭面浮腫，俗名為大頭瘟是也。或時眾人咽痛，或時聲啞，俗名為蝦蟆瘟是也。」¹⁵⁰ 約略同時的喻昌在《尚論篇》中亦云：「世俗所稱大頭瘟者，頭面腮頰，腫如瓜瓠者是也。所稱蝦蟆瘟者，喉痺失音，頸筋脹大者是也。」¹⁵¹ 然而，王肯堂、吳有性及喻昌等人對此的區別，反而可能混淆了此一疫病的真正面貌。其實，不論是大頭瘟，抑或是蝦蟆瘟，都可能是一種傳染病的多種病徵。

根據以上的描述，大頭瘟的主要病徵為：憎寒壯熱，頭疫身痛，昏憤，腮面紅赤，肩背斑腫，頸面、頭項俱腫，咽喉腫痛，及發病後數日即死亡。有不少中醫學者認為：大頭瘟、蝦蟆瘟或大頭風、大頭天行，係面顏部丹毒、流行性腮腺炎。¹⁵² 然而，流行性腮腺炎不可能造成嚴重的死亡，因此曹樹基認為大頭瘟或蝦蟆瘟，絕不會是腮腺炎，而斷定它是腺鼠疫。¹⁵³ 基本上，從死亡情況的嚴重程度來看，大頭瘟不是腮腺炎，應是可以確定的。¹⁵⁴ 而且，大頭瘟傳染的對象並沒有老少之別，這與腮腺炎的病患主要是青少年是不同的。但醫籍所載的大頭瘟，是否就如曹樹基所說的，是腺鼠疫？個人認為：傳統中醫可能將耳頰、頸部淋巴腺腫大的症狀，通指為大頭瘟。而依據現代臨床醫學顯示，會造成這些病徵的疾病相當多，當中自然也包含腺鼠疫，但卻不一定就是腺鼠疫。易言之，光憑這些症狀，很難斷言大頭瘟是何種疾病，僅知道它是一種傳染力極強的烈性傳染病。

¹⁴⁸ 張介賓，《景岳全書》上冊，卷二八，〈雜證謨·咽喉〉，頁492-493。

¹⁴⁹ 王肯堂，《證治準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67-771冊），卷八七，頁44b。

¹⁵⁰ 吳有性，《瘟疫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79冊），卷下，〈雜氣論〉，頁1b。

¹⁵¹ 喻昌，《尚論篇》（《叢書集成續編》第84冊），卷首，〈駁正序例〉，頁27b。

¹⁵² 參見施奠邦等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傳統醫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大頭瘟」條（嚴世芸撰），頁71-72；柯雪帆等主編，《中醫外感病辨治》（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頁291；李家庚等主編，《中醫傳染病學》（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7），頁267。

¹⁵³ 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頁18。

¹⁵⁴ 流行性腮腺炎患者的死亡率，僅達2%。

羊毛瘟

羊毛瘟係明代才見諸記載的瘟疫，在這之前的醫書及其它資料之中，皆未見述及。而在明代，羊毛瘟見於記載，亦多在萬曆以後，其流行於北京者，至少有兩次，即萬曆十五年及崇禎十六年。

有關於羊毛瘟的病徵，明代醫籍的記載甚少，因此必須借助筆記及地方志中的描述。據《名醫類案》記載萬曆十年（1582）北京流行的羊毛疔，其病徵為：「人身生泡瘤，漸大，痛死者甚眾，瘤內惟有羊毛。」¹⁵⁵ 萬曆三十二年（1604），江南亦出現羊毛瘟。據錢希言所著的《猗園》記載：

萬曆三十二年，吳中病疫，俗傳為羊毛瘟，民家醬甌、食器中，往往見之。王太學無曲家，日令僮子掃階前地，每早得羊毛半升許。未幾，病者瘳，妖亦遂絕。¹⁵⁶

根據此一記載，在羊毛瘟流行時，家中及戶外常可見到羊毛。同年秋，浙江衢州府江山縣也流行此一瘟疫。據載當時「日中飛絮，疫作，俗名羊毛瘟，市鄉死者甚眾」，¹⁵⁷ 則羊毛又隨風到處飄散。崇禎十一年（1638），南直隸太平府也患是疫，據方志記載：

（崇禎）十一年，大疫。又患羊毛疹，醫經所不載。其病先類傷寒，身熱三日，出瘤疹，脹甚，投以藥，皆死。有嫗得挑法，鍼刺中指中節間，出紫血少許，去羊毛一莖，隨愈。由是轉相傳授，始多活。未幾，老嫗死。¹⁵⁸

此條資料對於羊毛瘟的病徵及療法記載較詳，從中可知病起時會連續發高燒，身體出現瘤疹，服用一般的藥多不見效。一老嫗用針挑之法為人治病，則多有成效。其後，疫情稍減，但老嫗卻染疫而死。此外，在崇禎十四年（1641），浙江湖州、嘉興一帶也曾流行羊毛瘟。據《懷陳編》記載：

明崇禎辛巳（十四年），歲值奇荒，斗米（銀）四錢，艱於存活。順襄公挈家往嘉興，在途染瘟疫，夫妻、二子俱死。嗚呼！求生得死，滅及一

¹⁵⁵ 汪瓘，《名醫類案》卷九，〈疔瘡〉，頁274。

¹⁵⁶ 錢希言，《猗園》（《續修四庫全書》第1267冊），卷一五，「羊毛瘟」條，頁767。

¹⁵⁷ 同治《江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同治12年刊本影印，1970），卷一二，〈拾遺·祥異〉，頁26b。

¹⁵⁸ 康熙《太平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29年重刊本影印，1974），卷三，〈星野·祥異附〉，頁24b-25a。

門，真慘變也。按是時瘟疫盛行，所患病狀極奇怪不測，有名羊毛瘟者，果品、食物之中，忽生羊毛一根，人誤食之即病死。¹⁵⁹

文中所提到的順襄公一家，爲了逃荒而在途中感染羊毛瘟，全家四口悉數疫亡，看來此一瘟疫的病菌似乎相當凶惡。而在瘟疫流行時，同樣可以見到食品中到處是羊毛。另外，北京在崇禎十六年（1643）流行疙瘩瘟時，其患者在病起時亦「必有紅點在背，中包羊毛一縷」，一受感染，「無得活者」。¹⁶⁰ 這兩種瘟疫似乎有某程度的關連性。

綜合以上這些記載，可知羊毛瘟是一種身體會發高燒，並起泡瘤或瘤疹，且這些泡瘤會脹痛或劇痛的疾病，數日即死。且在泡瘤中多有羊毛。這種瘟病發生時，在醬甌、食器或果品、食物之中，也常可發現羊毛，人們若誤食之將導致死亡。然而，羊毛瘟究係何症？Dunstan 曾認爲羊毛瘟比較接近炭疽（anthrax），而非腺鼠疫。¹⁶¹ 不過，羊毛瘟是否爲炭疽，其實也需要檢視。由於相關的記載不足以確定它是何種傳染病，個人在此不擬多做考證。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在崇禎十六年北京大疫時，羊毛瘟曾與疙瘩瘟、吐血瘟同時流行；崇禎十七年江南疙瘩瘟、西瓜瘟盛行時亦然。或許它是一種跟疙瘩瘟有密切關連的傳染病。

疙瘩瘟、吐血瘟

明代北京的疙瘩瘟、吐血瘟，主要爆發於崇禎十六年。其中的吐血瘟，係此年才見諸記載的瘟病。至於疙瘩瘟，則在之前已經存在，並非明末始見。就現在所知，疙瘩瘟見於記載，大約始於金代。明初，《普濟方》（刊於永樂元年至二十二年〔1403-1424〕）在記載疙瘩腫毒時曾云：

時疫疔瘡腫毒病者，古方書論解，不見其說。古人無此病，故無此方。惟正隆楊公集《拯濟方》，內言自天眷（1138-1140）、皇統（1141-1148）間生於嶺北，次於太原，後於燕薊，山野頗罹此患，至今不絕，互相傳染，多至死亡，至有不保其家者。其狀似雲頭，腫連咽喉，……¹⁶²

¹⁵⁹ 同治《湖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同治13年刊本影印，1970），卷九四，〈雜綴一〉引《懷陳編》，頁31b。

¹⁶⁰ 花村看行侍者，《花村談往》，「風雷疫癘」條，頁39a。

¹⁶¹ 參見 Dunstan, "The Late Ming 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 p. 27.

¹⁶² 見朱楠，《普濟方》卷二七九，〈諸瘡腫門·毒瘡〉，頁1a-b。

按照《普濟方》的記載，疙瘩瘟起於金代，先出現於長城以北地區，其後延及山西，後來在直隸北部一帶也爆發流行，而且在元代以後一直未見絕跡。可惜的是，這種疫病在明末以前的流行情況，並不甚清楚。萬曆初年，吳昆（1551-?）在《醫方考》中曾述及此種瘟病，但未語及其在明代流行的情況。¹⁶³ 至崇禎十六年，此疫突在北京及華北其它地區爆發嚴重疫情。而在該年冬天至隔年春天，北京又出現了吐血瘟。

這一年爆發於北京的疙瘩瘟，其流行時間之長，在明代北京係屬空前絕後，而且也奪去相當多的生命。然而，何謂「疙瘩」？按明代北京的俚語，稱「身上生癩曰挖搭」。¹⁶⁴ 在清末，北京土話所謂的「疙瘩」，也常指疔腫；此外，人們發燒或身子軟弱時，腋窩的淋巴腺炎，當地人稱之為「筋疙瘩」。¹⁶⁵ 由此看來，所謂的「疙瘩」，有可能指皮膚上隆起的癰瘤，也有可能是指淋巴腺腫大的症狀。據資料記載，疙瘩瘟的患者，「身中不拘何處，起一塊，週日即死」。¹⁶⁶ 它之所以叫疙瘩瘟，係因為病者「人身必有血塊」。¹⁶⁷ 又劉尙友云：疙瘩瘟流行時，「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¹⁶⁸ 另據宋起鳳記述，這一年所爆發的瘟疫，其症狀為：

是歲，遍北京城內外，傳染疙瘩瘟一疫，古今方書所無。疫所中人，忽于身體肢節間突生小瘰一，食飲不進，目眩作熱，嘔吐如西瓜敗肉，多寡不一，三、二日即不起，百藥無救。¹⁶⁹

文中提到染疫者在身體肢節間會生小瘰的病徵，頗值得注意。這種肢節間生小瘰

¹⁶³ 吳昆在《醫方考》（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校注本，1985），卷一，〈瘟疫門〉中曾言及「疫癘積熱，時生疙瘩結毒，俗稱流注，面腫咽塞者」，宜用漏蘆湯；又言「疫毒內積，時生疙瘩者」，宜服消毒丸。見頁71-72。

¹⁶⁴ 徐昌祚，《燕山叢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8冊），卷二二，〈長安里語〉，頁6b。

¹⁶⁵ 參見御懽雅文編，《華語跬步》（收入波多野太郎編，《中國文學語學資料集成》〔東京：不二出版株式會社，1989〕第3篇第2卷），〈身體類〉，頁93, 95。此書原刊於明治三十六年（1903）。

¹⁶⁶ 趙某，《唐亭雜記》，頁5a。

¹⁶⁷ 徐樹丕，《識小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40編第3冊〔臺北：新興書局，1985〕），「甲申奇疫」條，頁533。

¹⁶⁸ 劉尙友，《定思小紀》，頁65。

¹⁶⁹ 宋起鳳，《稗說》卷二，「明末災異」條，頁49。

的症狀，包括另一記載所談到的「膝彎後有筋腫」。¹⁷⁰ 除此之外，染疫者亦有頭熱目眩，食慾不振等病狀，並吐血如西瓜汁，常兩三天即病亡。另據資料記載，一旦染上疙瘩瘟，常有猝死的慘劇：

（崇禎十六年）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病稱疙瘩，貴賤長幼，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兵科曹良直古遺，正與客對談，舉茶打恭，不起而殞。兵部朱希萊念祖，拜客急回，入室而殞。宜興吳彥昇，授溫州通判，方欲登舟，一价先亡，一价為之買棺，久之不歸，已卒于棺木店。有同寓友鮑姓者，勸吳移寓，鮑負行李，旋入新遷，吳略後至，見鮑已殞于屋；吳又移出，明晨亦殞。又金吾錢晉民同客會飲，言未絕而亡，少停，夫人、婢僕輩，一刻間殞十五人。又兩客坐馬而行，後先敘話，後人再問，前人已殞于馬鞍，手猶揚鞭奮起。又一民家合門俱殞，其室多藏，偷兒兩人，一俯于屋簷，一入房中，將衣飾疊包，遞上在簷之手，包積于屋已累累，下賊擎一包托起，上則俯接引之，上者死，下者亦死，手各執包以相縛。又一長班方煎銀，蹲下不起而死。又一新婚家合套坐帳，久不出，啟幃視之，已殞于床之兩頭。¹⁷¹

這一記載述及了各種聳人聽聞的死法，如談話間、騎在馬上與偷東西時猝然疫死，描述雖稍嫌誇張，但可見它是一種相當可怕的烈性傳染病。而從以上的記述看來，疙瘩瘟的主要病徵為頭暈目眩，並發高燒，身體隆起贅肉，並有血塊，肢節處生癰瘰。在感染之後，常有數日或單日內即暴斃的情況。這些病徵與腺鼠疫 (bubonic plague) 的臨床症狀，如發病急遽、發高燒、頭部劇痛、皮下出血、全身淋巴結腫大等症狀頗為近似。至於同一年發生的吐血瘟，係緊接著疙瘩瘟之後流行的，其病徵為吐痰血，流行季節在入冬以後，與臨床傳染病學所示的肺鼠疫症狀及季節是相符的，故極有可能就是肺鼠疫 (pneumonic plague)。¹⁷²

¹⁷⁰ 花村看行侍者，《花村談往》，「風雷疫癘」條，頁38a。

¹⁷¹ 花村看行侍者，《花村談往》，「風雷疫癘」條，頁37a-38a。

¹⁷² 依據研究，鼠疫主要類型有三，即腺鼠疫 (bubonic plague)、肺鼠疫 (pneumonic plague) 與敗血性鼠疫 (septicemic plague)。其中，腺鼠疫有發病急遽，初起時畏寒、發高燒，頭部劇痛，背部及四肢疼痛，顏面及結膜明顯充血，或黏膜及皮下出血等症狀，而以全身淋巴結腫大為主要病徵，常因敗血症而死。淋巴結腫大的部位，以鼠蹊部為最多，其次為腋下、頸部及鎖下等處。淋巴結腫脹小者如拇指，大可至雞蛋大小。其死亡率達50-90%。至於肺鼠疫，則以發病迅速、高熱、頭痛、胸痛、虛脫等全身毒血症狀，及咳嗽、呼吸急促等呼吸症狀為初期病徵，一二日後出現大量顏色鮮紅、流質或泡沫狀的

然而，要判定這年是否曾流行鼠疫，還必須有其它的證據，即在人間鼠疫流行之前或同時，常見鼠類大量死亡的情況。以往學者在討論此一議題時，雖有人注意及此，¹⁷³ 但多無法提出證據。個人在爬梳明人文集時，意外發現崇禎十六年北京瘟疫流行時曾有此一現象。此事據太常寺少卿吳麟徵（1593-1644）寫給朋友的信上說：

（今歲）夏秋，疫癘盛行，比屋而誅，弟所居一帶，登鬼錄者五十餘人，兩僕與焉。聞太倉之鼠，日死以數百計，……¹⁷⁴

這則太倉老鼠大量死亡的記載，對於推斷疙瘩瘟是否為腺鼠疫極為重要。晚近，Carol Benedict 之得以判定清代中葉雲南曾發生鼠疫，並展開其對十九世紀華南鼠疫的論述，老鼠大量死亡就是重要的證據。¹⁷⁵ 而從疙瘩瘟患者具有發病急遽、發高熱、身上隆起贅肉、肢節處生筋腫、皮膚並有血塊等症狀，再加上老鼠大量死亡這一證據，北京在崇禎十六年曾爆發鼠疫的可能性大為增加。

四、醫療體系與疫病救濟

在明代，不論是官方或是民間，對於疾疫的發生與蔓延，都極嚴肅地加以看待。其中，採取施藥或診療，是最常見的措施。此外，朝廷也常派遣官員出祭山川之神，或召張真人進行祈禳。至於地方官，除了展開施藥外，則多祭祀城隍

疫，二三天內死於心力衰竭，全身紫紺，死亡率達70-100%。其流行時間通常在氣溫寒涼的季節。而敗血性鼠疫，則更為凶險，又稱為猛暴型鼠疫。其病徵為高熱或竟無熱，無淋巴結腫大症狀，但會呈現全身中毒及中樞神經系統受破壞症狀，並有出血傾向，可在數小時或24小時內死亡，亦可能歷時二三天始病死。死亡率高達100%。參見戴佛香，《微生物與疾病》（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175-177；蔡承惠編著，《臨床傳染病學》（臺北：大學圖書出版社，1982），頁205-206；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頁594-595；李家庚等主編，《中醫傳染病學》，頁458-459；Robert S. Gottfried, *The Black Death: 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Robert Hale, 1983), pp. 7-8; Abraham I. Braude, Charles E. Davis & Joshua Fierer (eds.),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Medical Microbiology* (Hong Kong: W. B. Saunders Company, 1986), p. 1288; Sherwood L. Gorbach, John G. Bartlett & Neil R. Blacklow (eds.), *Infectious Diseases*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Company, 1992), pp. 1509-1510.

¹⁷³ 如馬伯英，參見其《中國醫學文化史》，頁595。

¹⁷⁴ 吳麟徵，《吳忠節公遺集》卷二，〈寄吳楚衡〉，頁33a。

¹⁷⁵ 參見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p. 23-24.

神。¹⁷⁶ 在明代北京歷次瘟疫流行時，國家所採取的回應措施，大致有以下幾種：(1) 設法掩埋屍體，(2) 派員祈禳，(3) 遣醫官診療及施藥。基本上，這些措施常是先後或同時展開的。

就設法掩埋屍體而言，在成化七年（1471）五月北京疫情升高之時，明憲宗對於「大疫流行，軍民死者枕藉於道」的情況，曾深表憐憫，於是下詔在京城崇文、宣武、安定、東直、西直、阜城六門郭外，各置漏澤園一所，收瘞遺屍。¹⁷⁷ 這是最基本的公共衛生處理措施，對於防止病菌的擴散自有其助益。而在嘉靖以後，國家於瘟疫流行時，通常也會提供草蓆及棺木，給予百姓裝裹其親人的屍骸。

在派員祈禳方面，神宗於萬曆十年（1582）三月京城災疫流行時，曾傳示禮部，命其擇日祈禱。¹⁷⁸ 崇禎十四年（1641）七月北京瘟疫盛行時，崇禎皇帝也曾於會極門召見正一教大真人張應京，命其禳疫。¹⁷⁹ 而在崇禎十六年（1643）秋疔瘡瘟疫大作時，張天師輯瑞適入京謁見，甫出都門不久，思宗急命將其追回，「諭其施符，噴咒、啐經清解，眠宿禁中一月，而死亡不減」。¹⁸⁰ 看來召張真人禳疫，效果似乎有限。

至於派員診療及施藥，在北京更是常見。北京做為明帝國的都城，乃是當時醫療資源最為豐富的一個城市。據明中葉吳寬（1435-1504）記述：當時「吳中業醫者百餘家」，而「京師業醫者，數倍于吳中」。¹⁸¹ 故在北京開業的民醫，當不在少數。而除了民醫之外，官方也有太醫院及順天府惠民藥局。明代太醫院的醫官及醫生額數，一般情況下多在300人以上。在永樂十五年（1417）營建紫禁城時，永樂皇帝派令赴北京安樂營醫治患病夫匠的醫士，就有350人。¹⁸² 宣德五年（1430），太醫院院判韓叔暘上疏談到：醫士逃逸及丁憂服滿不回任者，也有700多人。¹⁸³ 宣德十年（1435），禮部尚書胡濙奏稱：「太醫院見存醫士六百餘名，足備差役。」¹⁸⁴ 可見在十五世紀初，太醫院醫生的的人數曾在600名以上。至於明代

¹⁷⁶ 參見邱仲麟，〈明代的疫癘——兼及官民的肆應〉，頁32-42。

¹⁷⁷ 《明憲宗實錄》卷九一，成化七年五月辛巳條，頁2a。

¹⁷⁸ 《明神宗實錄》卷一二二，萬曆十年三月辛未條，頁6a。

¹⁷⁹ 《崇禎實錄》卷一四，崇禎十四年七月丁亥條，頁7a。

¹⁸⁰ 花村看行侍者，《花村談往》，「風雷疫癘」條，頁38a。

¹⁸¹ 吳寬，《家藏集》卷三六，〈慈幼堂記〉，頁4a-b。

¹⁸² 《明太宗實錄》卷一八八，永樂十五年五月戊子條，頁1a。

¹⁸³ 《明宣宗實錄》卷六八，宣德五年七月丁卯條，頁10b。

¹⁸⁴ 《明英宗實錄》卷一一，宣德十年十一月甲申條，頁5a。

後期的醫官數，據崇禎二年（1629）倉場侍郎南居益奏言：太醫院舊制，從院使、院判到醫士共止一百一十員；「沿至萬曆年間，官醫已增三百二十三員。迨天啓年間，增添日多。及至崇禎元年，官醫共計五百三十三名」。¹⁸⁵由此看來，萬曆年間官醫數是323名，崇禎元年增至533名。這些官醫與民醫加起來，構成了北京診療系統的主幹。換句話說，在瘟疫發生時，北京所能動員的醫者，要較其它城市多。其中，太醫院在編制上雖係皇家的醫療組織，但在京城瘟疫流行時，也常是重要的醫療團隊。明代自嘉靖以後，遇京師大疫時，就常啓動這一機制，命太醫院派遣醫官進行診療。

嘉靖後期

在嘉靖年間，北京除了既有的太醫院、惠民藥局之外，還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措施，即定期施藥、施粥的制度。這個措施，後來成爲明代臣子在瘟疫流行時，常會記起並加以運用的傳統與典範。根據明人郎瑛（嘉靖、隆慶時人）的記載，這一制度始於嘉靖二十年（1541）：

嘉靖二十年起，朝廷每歲一月，日散粥米二百石，丸藥六千囊。粥則人給一杓，可三、五口供也。藥則衣金者百丸，并符篆湯方各一紙。銀五分，銅錢十五文。共貯綾錦，計價三錢。惠下之心甚矣。¹⁸⁶

按此記載，北京自嘉靖二十年起，朝廷於每年的一月，每日施粥二百石，施藥六千包。施粥時每人給一大杓，可供三、五個人喝；藥則衣金藥丸百枚，加道符、湯方各一紙；並且施給白銀五分、銅錢十五文，再以綾錦製的袋子裝著，總計每袋價值白銀三錢。袋上還印著「凝道雷軒施」的字樣，而「凝道雷軒」正是明世

¹⁸⁵ 孫承澤，《山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9），卷二，〈京支錢糧數目〉，頁48。

¹⁸⁶ 郎瑛，《七修類稿》卷一四，〈國事類〉，頁207。清初，褚人獲所記則云其始於嘉靖二十三年（1544），且文字略有不同：「嘉靖甲辰（二十三年），朝廷於京師，每歲一月，日散粥米二百石，施藥六千囊。粥則人給一杓，可三、五口供也。藥則衣金者百丸，并符篆湯方各一紙，以白綾作袋，上刻印板云：『凝道雷軒施』。內貯銀五分、銅錢十五文，計價二錢，惠下之心至矣。雷軒，蓋世宗道號也。」參見褚人獲，《堅瓠續集》（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23編第9冊，臺北：新興書局，1978），卷一，「散粥施藥」條，頁10b。就現有資料判斷，嘉靖二十年應該是比較正確的。

宗的道號。¹⁸⁷ 由此看來，這個制度結合了施粥、施藥、施符咒與施銀錢四者，分別具有止饑、療疾、鎮邪、購置柴火煎藥的功用。明世宗基於其對道教的篤信所創立的這個制度（即後人所謂的「五城粥廠煮賑制度」），對於北京的遊民或貧窮百姓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社會救濟措施。不過，由於字面上稱之為「煮賑」，故大家通常會忽略其在施粥的同時，也對饑病的流民加以診療、並給予藥餌。¹⁸⁸

其實，當瘟疫蔓延時，窮苦百姓是相當渺小的，透過國家的醫療行動或其它措施的配合，局勢可能才得以改善。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即五城粥廠煮賑制度出現的次年，盛夏適逢大疫。是年五月，禮部左侍郎孫承恩（1485-1565）等人在奏疏上說：

臣等竊見比者時當盛夏，炎氣鬱蒸，積疹成災，散為疫癘。傳聞都城內外，民無老幼，傳染甚多，僵仆相繼。況窮巷蔀屋，單夫寡婦，食不充口，一有疾病，醫藥尤艱，坐視危殆。臣等考之《周禮》醫師之職，其屬有疾醫，以掌萬民之疾病，凡有疾病者，使分而治之，所以惠養黎元，重恤民命，為慮周矣。臣等愚見，伏望皇上勅下太醫院，差官督同順天府惠民藥局，給散藥材，檢驗方書，某方可防未病，某方可治已病，考論運氣，量治湯藥，分撥醫士九人，於九門人烟輳集之處，招諭給散，庶幾未病者得先事可免，已病者亦不至顛危。其於貧窶之人，尤為便益。……¹⁸⁹

這封奏疏清楚地指出瘟疫發生時，國家對於窮苦百姓的重要性。若國家不加以救濟，這些無依的百姓必致「坐視危殆」。明世宗在接到奏疏之後，隨即令太醫院差遣醫官，順天府籌措藥物，設法展開施濟。¹⁹⁰ 世宗本人還親自檢閱方書，製成「濟疫小飲子方」，「頒下所司，遵用濟民」，並命禮部刊行藥方。¹⁹¹ 至閏五月，禮部將御製濟疫方刊行完畢，尙書嚴嵩並摹印疫方，裝潢上呈。¹⁹² 而在

¹⁸⁷ 參上註。

¹⁸⁸ 基本上，五城粥廠施行直至明亡前夕，仍有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飢的事例。在明亡之後，這一制度並為清代所延續，直至清末仍然每年舉行。參見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粥廠煮賑〉，《淡江史學》9(1998)：115-117；〈清代北京的粥廠煮賑〉，《淡江史學》10(1999)：227-259。

¹⁸⁹ 孫承恩，《文簡集》卷五，〈請九門施藥疏〉，頁11a。《明世宗實錄》卷二六一，嘉靖二十一年五月丁酉條，頁2a-b。

¹⁹⁰ 《明世宗實錄》卷二六一，嘉靖二十一年五月丁酉條，頁2a-b。

¹⁹¹ 《明世宗實錄》卷二六一，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己酉條，頁4b。

¹⁹² 嚴嵩，《南宮奏議》（《續修四庫全書》第476冊），卷一七，〈刊布御製濟疫方具

官方展開施藥後，疫情似有所好轉。孫承恩在奏疏上說：

頃因時饑作疹，遂至疫癘肆行。既納臣言，命所司廣為治療。復慮宸慮，謂庸術渺克奏功。俯念民艱，親勞神運。爰稽祕錄，酌病宜以製方。特發內藏，備珍材以成劑。九門施散，爭來遠邑之民。萬口歡呼，頓脫顛連之苦。¹⁹³

這段文字雖不免帶有官場俗套，但在明代諸多帝王之中，親自為百姓檢閱方書，配製藥方，以冀瘟疫平息，也僅有明世宗一人而已。在孫承恩的認知中，應該還是覺得難能可貴。而就京城百姓而言，獲得皇帝親自所配的「濟疫小飲子方」，內心的感受，恐怕是感激涕零吧！

其後，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三月，世宗亦曾命禮部侍郎孫承恩、錦衣指揮使陸炳（1510-1560），於都城的朝天宮等寺廟進行施藥。¹⁹⁴ 嘉靖二十四年（1545）正月，世宗因「春時民多疾疫」，又命自正月十五日起，照往年方式，於朝天宮門外施藥。¹⁹⁵ 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因都城大疫，復下令禮部展開施藥、施粥與施棺。此事據《明世宗實錄》載云：

都城內外大疫，上聞之，諭禮部曰：「時疫太甚，死亡塞道，朕為之惻然。其令太醫院發藥，戶部同錦衣衛官，以米五千石，煮粥療濟，用副朕好生之意。死者，官給蓆藁，令所在居民收瘞之。」詔下，貧民全活者甚眾，遠方聞者，爭來就食。戶部尚書方鈍以人多食少，請益發廩以賑之。報可。¹⁹⁶

至嘉靖四十年（1561），世宗也因春冷，人多生疾，令太醫院自二月起，「依方修藥，隨病治療，差官同錦衣衛官，于九門分布給散，立夏日止」。¹⁹⁷ 嘉靖四十二年（1563）夏，瘟疫流行，世宗除命醫官施藥之外，又親自配製了方濟「如意飲」賜予百姓：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夏，天災流行，民多病疫。上命內使同太醫院官施藥餌於九門外，以療濟貧民。又命禮部官往來巡察，務使恩意及下。上親為製方，名「如意飲」。每藥一劑，盛以錦囊，益以嘉靖錢十文，為煎藥

題》，頁16a。

¹⁹³ 見孫承恩，《文簡集》卷五，〈謝賜藥疏〉，頁12a。

¹⁹⁴ 《明世宗實錄》卷二八四，嘉靖二十三年三月甲辰條，頁1a。

¹⁹⁵ 《明世宗實錄》卷二九四，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己酉條，頁2b-3a。

¹⁹⁶ 《明世宗實錄》卷四〇九，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乙亥條，頁2a。

¹⁹⁷ 《明世宗實錄》卷四九三，嘉靖四十年二月戊申條，頁4a。

之費。其憫念窮愁，仁慈懇惻，周悉如此。所費亦復萬計，不之惜也。¹⁹⁸
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正月，以京師民饑且疫，也曾諭命大學士徐階（1503-1583）派遣官員施藥、煮粥療濟。¹⁹⁹

萬曆年間

嘉靖年間，國家所展開的定期與臨時性的施藥，不論其成效如何，對於京城百姓而言，多多少少有一些幫助。其最大的意義在於建立了一套機制，成為萬曆年間類似情事發生時足資援引的傳統。而在這當中，太醫院的太醫，自然是抗疫最重要的成員。如萬曆三十六年（1608）北京疫癘流行時，當時嘉定醫者何其高適任職於太醫院，「沿門診療，貧者施以藥餌，全活以萬計」。²⁰⁰

在萬曆年間，朝廷於疫病流行時，也常展開施藥、施錢。其首次在萬曆十年（1582）大頭瘟爆發時。根據實錄記載：萬曆十年三月疫癘爆發，至四月疫情未見稍減，神宗於是命太醫院官「廣施藥餌，遍濟群生」。²⁰¹旋又降旨，蠲免都城百姓的房契稅。²⁰²迄至五月，由於營軍傳染，死者極眾。經給事中王鳳竹建議，神宗特發銀三千兩，賜給染病的貧軍。²⁰³

另外，在萬曆十五年（1587）北京羊毛疔流行時，由於疫情相當嚴重，大學士申時行（1535-1614）亦曾在五月題奏，建議仿照世宗的做法，對京城的瘟疫蔓延展開救濟：

茲者天時亢陽，雨澤鮮少，沴氣所感，疫病盛行。祖宗以來，設有惠民藥局，皇祖世宗屢旨舉行，乞勅禮部劄行太醫院，多發藥材，精選醫官，分劄於京城內外，給藥病人，以廣好生之德。²⁰⁴

¹⁹⁸ 張瀚，《松窗夢語》卷五，〈災異紀〉，頁99。

¹⁹⁹ 徐階，《世經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9冊），卷三，〈答設濟論〉（嘉靖四十四年正月初五日）、〈答出粟論〉（嘉靖四十四年正月初六日），頁13b-14b。
《明世宗實錄》卷五四二，嘉靖四十四年正月乙丑條，頁4b。

²⁰⁰ 見光緒《嘉定縣志》卷一六，〈人物二〉，頁12a-b。

²⁰¹ 《明神宗實錄》卷一二三，萬曆十年四月癸卯條，頁4b-5a。

²⁰² 《明神宗實錄》卷一二三，萬曆十年四月乙巳條，頁5a-b。張四維，《條麓堂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51冊），卷八，〈論免房稅疏〉，頁23a-b。

²⁰³ 《明神宗實錄》卷一二四，萬曆十年五月乙丑條，頁4a。

²⁰⁴ 《明神宗實錄》卷一八六，萬曆十五年五月甲午條，頁1b。

神宗旋批示：遵照所請，依嘉靖末年施藥方式，除給藥外，每家酌量給予銀錢一次。²⁰⁵ 由於京城疫氣盛行，神宗旋命太醫院精選醫官，分撥於五城地方診視、給藥，病患每戶並給予銀六分、錢十文，經費俱於房號銀及內太倉中動支。且特別叮嚀，「不許兵番人等作弊，及無病平人混冒重支」。²⁰⁶ 至五月底施藥行動結束，禮部隨即於六月初會奏五月份施藥的過程與花費如下：

奉聖諭施藥救京師災疫，即於五城開局，按病依方散藥。復差委祠祭司署員外郎高桂等五員，分城監督，設法給散。隨於五月三十日據中城等兵馬司造冊呈報五城地方給散銀錢，共散過患病男婦李愛等一萬六百九十九名口，共用銀六百四十一兩九錢四分，錢十萬六千九百九十文。五城會齊，俱於五月二十一日給散，一切病民，委霑實惠。太醫院委官御醫張一龍等造冊呈報，自五月十五日開局以來，抱病就醫，問病給藥，日計千百，旬日之外，疫氣已解，五城共醫過男婦孟景雲等十萬九千五百九十名，共用過藥料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八斤八兩，相應住止。……²⁰⁷

按照病患每戶給予銀六分、錢十文的規定，從這份奏報中可知，北京有10,699戶人家受到瘟疫波及，總計醫過的病患有109,590人，用的藥材數量為14,668.5斤。假設當時北京有80萬人口，則感染者達13.70%。然而這僅是最低的數字，畢竟在診療展開前已死亡的人口，今已無從得知，若再加上這些已死亡而無法來看病的病人數，此次瘟疫的染患率應該更高。不論如何，太醫院在十五天內醫過109,590人，平均每天診視7,306人，其規模不能說不大。

而在這年瘟疫大行時，正值營造天壽山的神宗陵寢，「大役繁興，民苦疾癘」，督造陵工的光祿寺少卿徐泰（1540-1598），曾設立醫局，「藥之而瘳」；又因「疫氣浸淫，流傳漸染，恐燥濕不時，以傷餘者，乃設病局，令病者分曹而處，民賴以安，所全活者萬眾，道路歌舞之」。²⁰⁸ 由是看來，徐泰採取了簡單的隔離措施，設立病局讓病者進住，以避免這些人將瘟疫傳染給其它的工人。但北京城中，似乎並未採行這種隔離病患的措施。

²⁰⁵ 《明神宗實錄》卷一八六，萬曆十五年五月丙申條，頁2a。

²⁰⁶ 《明神宗實錄》卷一八六，萬曆十五年五月丁酉條，頁4a。

²⁰⁷ 《明神宗實錄》卷一八七，萬曆十五年六月戊寅條，頁9b-10a。

²⁰⁸ 范允臨，《翰寥館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影明刊本，1971），卷五，〈明太僕寺少卿與浦徐公暨元配董宜人行狀〉，頁18b。

崇禎十六年

如前所言，崇禎十六年的疙瘩瘟、吐血瘟，是北京在明代所遭逢的最嚴重瘟疫。面對這樣的大瘟疫，帝國其實是有些捉襟見肘、力不從心。當時，內閣首輔是非東林黨的周延儒，本身無所作爲，一味以鞏固己位爲考量；其它有識的官員則被貶或被辭退，政局也傾軋於黨爭之中。²⁰⁹ 在瘟疫大流行的同時，帝國又剛好處於內憂外患的當兒。從這年的年初起，清兵在山東一帶橫行無阻，至三月間從山東北上，於來去之間，據說共攻下了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八十八座城鎮，獲黃金12,250兩、銀220萬5,277兩、珍珠4,440兩、緞52,230匹、緞衣33,720領、貂皮等600多張，俘獲36萬9千餘人，牛馬等共32萬1千餘頭。²¹⁰ 而在同一年，李自成於湖北襄陽設立襄京，改稱新順王後，決定揮師北上，展開其進攻北京的計畫；張獻忠則由淮南進入湖廣，最後攻下長沙、衡州。²¹¹ 在這樣的情況下，思宗無法像之前的世宗、神宗那樣，可以全心全意來應付這場人類與病菌的戰爭。

或許是受限於財政的困難與其它的因素，思宗並未在瘟疫已開始蔓延的二月即展開施藥，而是在疫情已極其嚴重的七月底，才下令發銀二萬兩，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者；並發銀一千兩，令太醫院醫官分城醫治病民。²¹² 思宗之所以採取此一措施，係因駙馬鞏永固上疏，題奏「都門疫癘盛行，災黎罹害最慘，懇乞皇上軫念子遺，亟賜拯救，以重根本，以廣皇仁」。思宗看了之後批示：

覽奏：都門時疫傳染，殊可惻念。御前特發銀一千兩，著太醫院即合藥，差官醫分投醫治；再發銀二萬兩，著都察院分發五城察院，有病疫的酌給，以為棺木、掩埋之資，用示軫恤，仍著府城兩縣停刑清獄，竭誠祈禳，以圖消弭。該衙門知道。欽此！²¹³

左都御史李邦華（1574-1644）在七月二十九日，接到刑科抄出駙馬都尉鞏永固這

²⁰⁹ 參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頁71-73。

²¹⁰ 孫文良、李治亭、邱蓮梅，《明清戰爭史略》，頁375。

²¹¹ 李文治，《晚明民變》（北京：中華書局據該書局1948年版影印，1989），頁123-126；James Bunyan Parsons,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0), pp. 106-113, 149-154.

²¹² 《崇禎實錄》卷一六，崇禎十六年七月庚申條，頁13a。

²¹³ 李邦華，《李忠肅公集》卷六，〈奏報領銀施棺疏〉，頁87a-b。

一奏本後，當天即差遣都察院司務司司務區志遠，前赴承運庫領出銀二萬兩，分發予巡視五城的御史向北、任天成、王燮、鄭封、傅景星等，每城各分銀四千兩，視察所轄之內有死無棺、殯無人者，酌量給予銀兩。²¹⁴ 而爲了解決施棺的諸多問題，李邦華曾集合巡城各御史會議，御史王燮等認爲：棺木必購自行戶，而在這用者極眾的當兒，木材有限，「昔時一金之價，即三倍不可得」，且棺木透過五城兵馬司的坊差發放，難免有勒索之弊，故「給棺不若給銀」。爲此，眾人議定：廣貼告示，令百姓自行報名，但須鄰居切結，防範冒領。「又親審其長幼爲差等，令得隨便自辦。更嚴禁總甲需索，門役刁阻」。其全家病歿的，責成鄰家處理；街上倒斃的，由兵馬司負責掩埋，仍給予欽賜銀兩。議定之後，御史按此執行。²¹⁵ 後來由於死亡人數太多，銀兩不敷使用，思宗再發三千兩買棺，但還是不夠用。²¹⁶

崇禎十六年北京的大疫，帶給醫療體系極大的考驗。在此之前，嘉靖、萬曆年間的大疫，頂多流行數月即得到控制。但這年的大疫，從仲春直至冬天，甚或至隔年春，嚴重流行幾近一年，情勢實已失去控制。太醫院的醫官們，面對較前嚴厲的大瘟疫，可說是難以招架。究其原因，雖可能牽涉到太醫院醫官的素質、藥材的好壞與藥方是否對症，卻也與財政困窘有關。崇禎朝財政之困窘，爲眾人所皆知，面對此一凶惡的瘟疫，朝廷所撥給的醫療銀兩才僅一千兩，顯然是杯水車薪，故疫情亦一直無法得到控制。當然，病菌的益發兇猛，可能也必須加以考慮。不論如何，在疫情進入高峰的八月，官方總算展開施藥，然從陳龍正（1585-1645）代任天成所寫的奏疏中，施藥似乎亦有其未周之處：

竊見瘟疫日盛，藥局所施，多用煎劑，方之當否，固未可知，即令處方必中其病，而以至貧之民，犯至急之症，領藥入手，無錢買罐，無力炊煤，徬徨半日之間，病者已多稿項矣。臣訪得各坊屢有善士，製造五瘟丹施捨，臣曾揭視其方，大抵以五運為主。今年戊癸化火，故其藥純用清涼，消解熱毒，傳聞領者十起八、九。或丸或末，每服不過一錢二分，價銀約止一分，藥到用水調服，既濟其急，更便於貧。此雖若至微至瑣之事，而在今日，以活人為急，雖謂之至鉅至要之事可也。專藉民間施捨，所及有

²¹⁴ 李邦華，《李忠肅公集》卷六，〈奏報領銀施棺疏〉，頁87b-88a。按：文中所記的區志遠，可能即是前面所談到會治疫鬼的區致遠。

²¹⁵ 李邦華，《李忠肅公集》卷六，〈奏報奉行施棺疏〉，頁85a-86b。

²¹⁶ 花村看行侍者，《花村談往》，「風雷疫癘」條，頁38a。

幾，即臣等私相傳播，終難徧感人心，一出天言，使藥局即日合施此藥，則起死人而肉白骨，日當以千計矣。藥之能生人者多，則棺之給死人者當漸少，……²¹⁷

從此段文字可知，官方沿襲之前的做法，施的是藥包，百姓須自行煎煮；而民間所施的五瘟丹，則以藥丸或藥粉為主。就時效而言，官方所施的藥，是有緩不濟急的缺點，不像民間所施的藥，可以直接吞服，且費用也不高。然而，官方在昔時行之或有效，而此次卻失去控制，則問題自不在於這藥包或藥丸上面，當是用藥上有問題。

北京在此之前，其歷次瘟疫的流行期間，均未見民間施藥的事例。而在這一年，則有士紳展開施藥。當瘟疫流行時，在京任職的金鉉（1610-1644），就曾「製五瘟丹施之，親自和藥，晝夜不殆者數月，所全活甚眾。家中上下幾五十人，絕無病且死者，都人奇之」。²¹⁸ 不過，就如陳龍正在上段引文中所說的，「專藉民間施捨，所及有幾」，民間施藥所能發揮的作用還是有限，故希望透過明思宗的金口，將民間所施的藥方傳播出去。除此之外，民間對付疙瘩瘟也有其它的療法。據《花村談往》記載：有位來京候補縣丞的福建人，「曉解病由，看膝彎後有筋腫，起紫色，無救；紅者，速刺出血，可無患。來就看者，日以萬計」。²¹⁹ 另外，宋起鳳在《稗說》中亦云：「其什百中得生者，惟有挑毒法。用銀簪腳就瘰上刺破，挑得紫血出則蘇，否則必死。」²²⁰ 究其所用，其實與應付羊毛瘟的方法是相同的。

五、餘論：瘟疫與帝國的崩潰

北京在崇禎十六年二月起，至隔年春天止所發生的這場大瘟疫，由於疫情無法控制，曾導致人口大量死亡。其中死亡者，又以下階層及「閒的兒」²²¹ 最

²¹⁷ 陳龍正，《幾亭全書》（《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2冊），卷四〇，〈軫疫施藥疏〉，頁25b-26a。

²¹⁸ 金鉉，《金忠節公文集》卷八，〈年譜〉，頁13a。

²¹⁹ 花村看行侍者，《花村談往》，「風雷疫癘」條，頁38a-b。

²²⁰ 見宋起鳳，《稗說》卷二，「明末災異」條，頁49。

²²¹ 所謂的「閒的兒」，應係叫花子之類的遊民。清初，釋元璟曾有詩詠「閒的兒」云：「畊田性不耐勞苦，讀書少也失父師。作官那得才與粟，行販又乏囊中資。肚饑無飯衣無

多，而影響最大的，則為京營的兵丁。崇禎十七年（1644）春，王家彥（?-1644）在寫給左都御史李邦華的信中說：「聞十餘萬旅，瘟疫之後，缺額數萬。」²²² 明遺民張怡也說：在「荒疫之後，幾於空伍。甲申寇至，點萬人上城，亦不能足數」。²²³ 清初，談遷（1594-1657）也說：崇禎十六年夏、秋間，「畿內大疫，營兵半空」。²²⁴ 不過，大疫所造成的兵員大損，除了來自於兵丁疫死之外，還另有緣故。明代中葉以後，防守京師的京營，原就存在著嚴重的吃空缺現象。明遺民林時對曾提到：「余在長安，班役多竄籍三大營，冒名支糧，每月至三四石，遇操期則倩人畫卯耳。」²²⁵ 蔣臣亦云：「京兵舊止空籍，凡負販諸傭及各衙門班役皆是也，臨點則募市人充之。」而歷經此次大疫，這些充場面的人手，死耗達「十之六七」。²²⁶ 也就因為臨時應募點名的百姓大量死亡，無法找到人手填補，才造成了「缺額數萬」與「營兵半空」。

此次大疫，除了造成兵丁及負販、傭工之流的死傷外，還使得叫花子大量倒斃，結果在次年三月李自成包圍北京城時，要僱用乞丐守城都發生困難。據說是年瘟疫，「人已去其半，故至次年闖圍城時，京花子亦無處僱倩」。²²⁷ 據蔣臣所見，當時掌軍事者「下氣怡聲，卑詞戶曉，逾五六日尚未集」。後來勉強「五塚置一人，皆尪瘠老弱、鳩形鵠面，充數而已」。²²⁸ 又據資料說：「守陣軍皆貴近家詭名冒糧，臨時倩窮人代役，僅給黃錢五十文，雖外城二堵置一卒，內城五堵置一卒，率飢疲不堪任，老幼內監俱乘城，凡數千人。」²²⁹ 相較於崇禎九年

禱，老天養就閒的兒。人人有錢皆可須，不忮不求亦不迂。請君弗笑閒的兒，除了京師天下無。」見釋元璟，《完玉堂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11冊），卷七，〈京師百詠〉，頁9b。

²²² 王家彥，《王忠端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62冊），卷一〇，〈與李懋明總憲書〉，頁39b。

²²³ 張怡，《謏聞續筆》卷三，頁11a。

²²⁴ 談遷，《叢林雜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3冊），〈和集·叢贅〉，「兵疫」條，頁75b。

²²⁵ 林時對，《荷菴叢談》（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據手稿本影印，1990），卷三，「京營之弊」條，頁302。

²²⁶ 蔣臣，《無他技堂遺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2冊），卷一五，〈遯荒紀略〉，頁3b。

²²⁷ 趙某，《唐亭雜記》，頁5b。

²²⁸ 蔣臣，《無他技堂遺稿》卷一五，〈遯荒紀略〉，頁3b。

²²⁹ 鄒漪輯，《明季遺聞》（《續修四庫全書》第442冊），卷一，〈北都〉，頁34b。

(1636)、十五年(1642)的京師戒嚴，崇禎十七年守城的情況極糟。據資料記載：

丙子(崇禎九年)、壬午(崇禎十五年)間，清兵圍城，京師每堵五人守城。一人造飯，一人往來城下，其三人輪替看堵。其人乃京營兵僱倩足數。至癸未(崇禎十六年)大疫，凡京城窮人盡死，故至甲申(崇禎十七年)初守城，人守五堵，至內相上城，凡大小火皆往，又多方僱倩，始得一人守一堵焉。²³⁰

另據楊士聰云：三月十七日一早，京城還沒什麼防禦；午刻，西直門外突然出現數名「賊騎」揮刀砍殺，於是才倉促閉門，傳令軍士上城，「每八垛僅得一人」。申刻，思宗「令各監局掌印，下至小火者俱上城，每一垛始得一人。又炊竈未立，乃以錢抵市，括食上城」。²³¹ 當時守城軍士的情況甚為淒慘：

京城堞十五萬四千有奇，京兵羸弱者四萬人，其數僅當三之一，併淨身男子三四千人上城設守。內丁俱擇便處站立，營軍立風雨中，糧又不以時給，城堵人馬雜沓，又不能具斧爨，人給百文買粥糜食之，飢而且寒，日切怨望。²³²

以上諸多記載，雖多有未盡一致之處(特別是多少人守一垛的部份)，但從這些描述，可以看出情況之狼狽，從而也可以看到崇禎十六年疫病所造成的人力損失，對於崇禎十七年北京城的防務，有相當大的影響。換言之，持續近一年的大瘟疫，已經將整個北京防守的人力擊潰泰半，至次年三月李自成包圍北京時，其實已經存在人力嚴重不足的問題。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崇禎十六年的大瘟疫，間接造成了北京的淪陷與明朝的滅亡。

實際上，崇禎十六年的大瘟疫，除了癱瘓帝國中樞的防守人力之外，後來也可能麻痺了帝國的身體部份。在這一年，疙瘩瘟在直隸等地也爆發大流行。直隸昌平州是年大疫，「名曰疙瘩病，見則死，至有滅門者」。沙河亦然。²³³ 順天府通州在是年七月也大疫，同樣叫疙瘩病，「比屋傳染，有全家喪亡，竟無收殮者」。²³⁴ 河間府景州亦「瘟疫大行，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²³⁵ 據資料記

²³⁰ 趙某，《唐亭雜記》，頁5b。

²³¹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5)，頁11。

²³² 沈頤仙，《遺事瑣談》卷一，〈懷宗紀略〉，「駙馬」條，頁25。

²³³ 見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臺北：文星書店影印，1964)，《方輿彙編·職方典》卷三九，〈順天府部〉，頁401。

²³⁴ 光緒《通州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光緒5年刊本影印，1968)，卷末，〈雜識〉，

載，這一年的大疫，「南北數千里，北至塞外，南踰黃河，十室鮮一脫者」。²³⁶蔓延的結果，在崇禎十七年（1644）春天，甚至襲擊了江南。崇禎十七年春，蘇州府盛行疙瘩瘟，又名西瓜瘟，病者「吐血一口如西瓜狀，立刻死」，²³⁷或「無病而口中噴血輒死」，²³⁸或「民嘔血縷即死」。²³⁹另外，浙江的湖州府，同年春也吐血性瘟疫大作，「民嘔血縷即死」。²⁴⁰

而當崇禎十七年江南流行西瓜瘟的同時，疙瘩瘟仍在華北地區繼續肆虐。一直到滿清入關，疫情依然。是年天津此疫盛行，俗稱此病為探頭病，意謂著一探頭即受感染而死。²⁴¹順治元年（1644）九月，漕運總督駱養性在上奏時指出：

天津地方，神京咽喉，水陸通衢，從來人民輳集，近被流賊毒害，地方凋殘，人不聊生，困苦已極。詎意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傳染之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合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去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天心降割，至此已極，不謂今日津門復罹此慘也。一人染疫，傳及閭家，兩月喪亡，至今轉熾。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藁充途，哀號滿路。誠有耳所不忍聞，目所不忍見者。²⁴²

另外，在李自成部隊移動的過程中，病菌也隨之散播。據康熙《懷來縣志》記

頁96b。

²³⁵ 康熙《景州志》（北京：中國書店據康熙19年刻本影印，1992），卷四，〈災變〉，頁60a。

²³⁶ 民國《青縣志》（天津：鴻興印字館鉛印本，1931），卷一三，〈故實志·祥異篇〉，頁6b。

²³⁷ 徐樹丕，《識小錄》，「甲申奇疫」條，頁533。

²³⁸ 朱梅叔，《埋憂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排印本，1978），「疫異」條，頁36。

²³⁹ 乾隆《震澤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19年重刊本影印，1970），卷二七，〈災祥〉，頁13b。

²⁴⁰ 同治《湖州府志》卷四四，〈前事略·祥異〉，頁19a。光緒《歸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8年刊本影印，1970），卷二七，〈祥異〉，頁17a。民國《德清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20年鉛印本影印，1970），卷一三，〈雜誌〉，頁17a。

²⁴¹ 康熙《天津衛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23年易社新校鉛印本影印，1968），卷三，〈災變〉，頁30a。

²⁴²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影印，1986-1995），A1-162，B383。

載：「是年，凡賊所經地方，皆大疫，不經者不疫。」²⁴³ 九月間，宣府鎮的「保安衛、沙城堡，絕者不下千家。生員宗應祚、周之正、朱家輔等皆全家疫歿，雞犬盡死」。²⁴⁴ 而在山西南部的潞安府，七月間亦大疫，「病者先於腋下、股間生一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²⁴⁵

結論

明代 (1368-1644) 北京的瘟疫，前後共計十五次。從史料上看，這些瘟疫集中在嘉靖、萬曆、崇禎年間，疫情最嚴重的，則是崇禎末年的大疫。而在這十五次中，爆發於西元一五四〇年以後者，就佔了十三次。

就資料所示，明代北京這十餘次重大的瘟疫當中，可知其流行瘟疫的病名者僅有數次，即大頭瘟在萬曆十年 (1582)、萬曆四十年 (1612) 曾經流行；羊毛瘟則發生在萬曆十五年 (1587) 及崇禎十六年 (1643)；至於疙瘩瘟及吐血瘟，則爆發於崇禎十六年。大頭瘟的主要病徵為：憎寒壯熱，頭疫身痛，昏憤，腮面紅赤，肩背斑腫，頸面、頭項俱腫，咽喉腫痛，及發病後數日即死亡。至於羊毛瘟的症狀，則是身體會發高燒，並起泡瘤或瘤疹，且這些泡瘤會脹痛或劇痛，數日即死。以上這兩種瘟疫到底是現在所知的那些疾病，個人於此未多做推測。至於疙瘩瘟，由於流行時曾有老鼠大量死亡的記載，加上疙瘩瘟患者有發高燒、身體起血塊、肢節處生瘤瘰，以及數日即死或猝死的症狀，與鼠疫發病急遽、高燒不退、皮下組織出血、身體肢節間淋巴腺腫大，及數日即病死等病徵頗為類似，故極有可能是腺鼠疫 (bubonic plague)。而同年發生的吐血瘟，除了病徵為吐痰血之外，流行季節在入冬以後，與臨床傳染病學所示的肺鼠疫症狀及季節也相符合，是肺鼠疫 (pneumonic plague) 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歐洲在十四世紀以後，受到鼠疫大流行的影響，曾引發國家對於防疫體系、公共衛生的重視；²⁴⁶ 明代後期北京的一連串瘟疫，是否也對國家產生這方面的

²⁴³ 康熙《懷來縣志》卷二，〈災異〉，頁17b。

²⁴⁴ 同上。

²⁴⁵ 順治《潞安府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順治18年刊本影印，1968），卷一五，〈紀事·災祥〉，頁62b-63a。光緒《長治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光緒20年刊本，1976），卷八，〈大事記〉，頁36b。

²⁴⁶ 參見 George Rosen,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影響？就現存資料所見，明帝國在這十餘次瘟疫當中，主要是動用太醫院及順天府惠民藥局等醫療體系，對患者進行診療、施藥，並未制定類似西方檢疫制度的辦法，以控制疫情。不過，明世宗在嘉靖二十年（1541）所創設的五城粥廠煮賑制度，其每年冬春的定期施藥、施粥措施，在平時具有預防性的意義，而在瘟疫發生時，更是協同以進行救濟的一個機制。

瘟疫的發生，除了影響到居民的生命安危之外，也同時考驗國家的醫療體系。在嘉靖、萬曆年間，帝國的醫療體系對於北京瘟疫的應變，相較於崇禎年間，似乎還算有效，疫癘通常在盛行二、三個月後，即漸漸消散。然而，面對崇禎十六年（1643）的大瘟疫，國家的醫療體系顯然無法招架，故而瘟疫從春天流行至冬天，甚至崇禎十七年的春天，時間可能長達一年。也正因為帝國欠缺應變這場大瘟疫的能力，故而導致人口大量死亡。根據記載，這一年的瘟疫至少奪去二十萬條人命，其中又以軍士及下階層的百姓、乞丐最多。這一情況，後來也影響到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的京城防衛戰，造成防守人力不足，進而導致北京的陷落。以往學者在談到北京淪陷的原因，常提出政治性的因素，然而當軍事防衛的人力因瘟疫侵襲而大量死亡或者弱化，其對戰局的影響可能更大。畢竟在軍事決戰的當兒，兵力與戰力更為重要。

2001年9月初稿，2002年11月二稿

2003年5月三稿，8月定稿

（本文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九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脫胎於拙作〈明代的疫癘——兼及官民的肆應〉(1996)一文，該文在撰寫期間及會議上宣讀時，曾得到許多師長的斧正，本文於近期撰寫時亦多受惠於他們的意見。在此，謹對給予該文及本文斧正的師長，如徐泓師、劉翠溶老師、王業鍵先生、梁其姿老師、康豹 (Paul R. Katz) 先生、林富士先生、金仕起先生等，表示誠摯的謝意。另外，也要感謝兩位審查人所給予的意見與修改建議。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丁元薦，《西山日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子部第242冊。
- 于敏行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3。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影印，1986-1995。
- 文秉，《烈皇小識》，上海：神州國光社排印本，1947。
- 王直，《抑菴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41-1242冊。
- 王鏊，《震澤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56冊。
- 王世德，《崇禎遺錄》，收入《明史資料叢刊》第五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 王肯堂，《證治準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767-771冊。
- 王思任，《王寄重十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7。
- 王思任，《謔菴文飯小品》，《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00，第1368冊。
- 王家彥，《王忠端公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162冊。
- 申涵光，《鳧盟先生年譜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集部第207冊。
- 朱橚，《普濟方》，《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747-761冊。
- 朱梅叔，《埋憂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排印本，1978。
- 朱察卿，《朱邦憲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集部第145冊。
- 江東之，《瑞陽阿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集部第167冊。

- 何孟春，《餘冬序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子部第101冊。
- 何偉然等評選，《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集部第378冊。
- 何景明，《大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67冊。
- 吳 昆，《醫方考》，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校注本，1985。
- 吳 寬，《家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55冊。
- 吳有性，《瘟疫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779冊。
- 吳麟徵，《吳忠節公遺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81冊。
- 宋起鳳，《稗說》，收入《明史資料叢刊》第二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 李邦華，《李忠肅公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81冊。
- 李東陽等，正德《大明會典》，東京：汲古書院影正德四年司禮監刊本，1989。
- 李流芳，《檀園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95冊。
- 李遜之，《三朝野記》，收入《荆駝逸史》（《明清史料彙編》三集），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8。
- 李鶴林，《集異新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32編第8冊，臺北：新興書局，1981。
- 沈 榜，《宛署雜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0。
-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59。
- 沈頤仙，《遺事瑣談》，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據清鈔本影印，1976。
- 汪 瓘，《名醫類案》，臺北：宏業書局據清刊本影印，1971。
- 岳 正，《類博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46冊。
- 林時對，《荷廬叢談》，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據手稿本影印，1990。
- 花村看行侍者，《花村談往》，收入《說鈴》，臺北：新興書局影印，1968。
- 金 鉉，《金忠節公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陸輯第26冊。
- 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3。

邱仲麟

- 俞 彥，《俞少卿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陸輯第23冊。
- 姚 旅，《露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子部第111冊。
- 姚希孟，《棘門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178冊。
- 胡介祉，《茨村詠史新樂府》，《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捌輯第26冊。
- 范允臨，《輸寥館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影明刊本，1971。
- 范景文，《文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95冊。
- 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4。
- 郎 瑛，《七修類稿》，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
- 夏良勝，《東洲初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69冊。
- 孫承恩，《文簡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71冊。
- 孫承澤，《山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9。
- 徐 充，《暖姝由筆》，《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第213冊。
- 徐 渭，《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3。
- 徐 階，《世經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集部第79冊。
- 徐昌祚，《燕山叢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子部第248冊。
- 徐樹丕，《識小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40編第3冊，臺北：新興書局，1985。
- 桂 萼，《文襄公奏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史部第60冊。
- 秦景明，《症因脈治》，臺北：旋風出版社，1972。
- 馬文升，《端肅奏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427冊。
- 張 怡，《謏聞續筆》，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22編第8冊，臺北：新興書局，1978。
- 張 瀚，《松窗夢語》，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
- 張介賓，《景岳全書》，上海：上海科學出版社影印，1959。

- 張四維，《條麓堂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00，第1351冊。
-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
- 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臺北：文星書店影印，1964。
- 陳龍正，《幾亭全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12冊。
- 陸簡，《龍臯文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集部第39冊。
- 喻昌，《尚論篇》，《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第84冊。
- 黃宗羲編，《明文海》，北京：中華書局影清抄本，1987。
- 楊士聰，《玉堂薈記》，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影抄本，1977。
-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5。
- 鄒漪輯，《明季遺聞》，《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00，第442冊。
- 熊開元，《魚山剩稿》，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40編第4冊，臺北：新興書局，1986。
- 褚人穫，《堅瓠續集》，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23編第9冊，臺北：新興書局，1978。
- 趙某，《唐亭雜記》，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38編第9冊，臺北：新興書局，1985。
-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0。
- 劉尚友，《定思小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5。
- 劉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94。
- 蔣臣，《無他技堂遺稿》，《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72冊。
- 談遷，《棗林雜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子部第113冊。
- 錢希言，《獮園》，《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00，第1267冊。
-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5。
- 謝肇淛，《小草齋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集部第176冊。
- 謝肇淛，《五雜俎》，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影標點本，1977。
- 羅天尺，《五山志林》，《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嚴 嵩，《南宮奏議》，《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00，第476冊。
- 竇 儀，《宋刑統》，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4。
- 釋元璟，《完玉堂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集部第211冊。
- 龔廷賢，《萬病回春》，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點校本，1993。
- 御幡雅文編，《華語跬步》，原刊於明治三十六年（1903），收入波多野太郎編，《中國文學語學資料集成》，東京：不二出版株式會社，1989，第3篇第2卷。
- 順治《潞安府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順治18年刊本影印，1968。
- 康熙《天津衛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23年易社新校鉛印本影印，1968。
- 康熙《太平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29年重刊本影印，1974。
- 康熙《景州志》，北京：中國書店據康熙19年刻本影印，1992。
- 康熙《懷來縣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康熙51年刊本。
- 乾隆《震澤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19年重刊本影印，1970。
- 同治《江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同治12年刊本影印，1970。
- 同治《湖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同治13年刊本影印，1970。
- 光緒《長治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光緒20年刊本，1976。
- 光緒《容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22年刊本影印，1969。
- 光緒《通州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光緒5年刊本影印，1968。
- 光緒《嘉定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影印，1991，第7冊。
- 光緒《歸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8年刊本影印，1970。
- 民國《青縣志》，天津：鴻興印字館鉛印本，1931。
- 民國《德清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20年鉛印本影印，1970。

二、近人論著

于德源

- 1998 《北京農業經濟史》，北京：京華出版社。

尹鈞科、于德源、吳文濤

- 1997 《北京歷史自然災害研究》，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文煥然、文榕生

- 1996 《中國歷史時期冬半年氣候冷暖變遷》，北京：科學出版社。

王育民

- 1987 《中國歷史地理概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上冊。

- 伍連德
1936 〈中國之鼠疫病史〉，《中華醫學雜誌》22.11：1039-1055。
- 李文治
1989 《晚明民變》，北京：中華書局據該書局1948年版影印。
- 李尚仁
2001 〈歐洲擴張與生態決定論——大衛阿諾論環境史〉，《當代》170：18-29。
- 李家庚等主編
1997 《中醫傳染病學》，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 汪榮祖
1989 〈氣候變化與明清代興〉，《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333-336。
- 孟洛 (W. B. Munro) 著，宋介譯
1926 《市政原理與方法》，上海：商務印書館。
- 林榮茂、林環編
1982 《微生物學》，臺北：南山堂出版社。
- 竺可楨
1979 〈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竺可楨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475-498。
- 邱仲麟
1991 〈明代北京的地理形勢、氣候與都市環境管理：一個人文角度的觀察〉，《史原》18：55-99。
1996 〈明代的疫癘——兼及官民的肆應〉，第一屆兩岸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96年7月23至24日。
1998 〈明代北京的粥廠煮賑〉，《淡江史學》9：113-130。
1999 〈清代北京的粥廠煮賑〉，《淡江史學》10：227-259。
- 施奠邦等編
1992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傳統醫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柯雪帆等主編
1993 《中醫外感病辨治》，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 洗維遜編著
1990 《鼠疫流行史》，廣州：廣東省衛生防疫站。
- 范行準
1986 《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邱仲麟

孫文良、李治亭、邱蓮梅

1986 《明清戰爭史略》，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馬伯英

1994 《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張丕遠主編

1996 《中國歷史氣候變化》，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

張志斌

1990 〈古代疫病流行的諸種因素初探〉，《中華醫史雜誌》1990.1：28-33。

張嘉鳳

1996 〈清初的避痘與查痘制度〉，《漢學研究》14.1：135-156。

曹樹基

1995 〈地理環境與宋元時代的傳染病〉，《歷史地理》第1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183-192。

1997 〈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歷史研究》1997.1：17-32。

2000 《中國人口史·明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梁其姿

1987 〈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臺北：食貨出版社，上冊，頁239-253。

梁庚堯

1999 〈南宋城市的公共衛生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0.1：119-163。

梅莉、晏昌貴

1996 〈關於明代傳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學學報》1996.5：80-88。

陳高備編

1939 《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上海：暨南大學。

湯仲鑫等編著

1990 《海河流域旱澇冷暖史料分析》，北京：氣象出版社。

費克光 (Carney T. Fisher)

1994 〈天花、商賈和白蓮教——嘉靖年間明朝和蒙古的關係〉，《明史研究》第4輯，合肥：黃山書社，頁231-241。

1995 〈中國歷史上的鼠疫〉，《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下冊，頁673-745。

黃彰健編著

1979 《明代律例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楊正泰
1994 《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經利彬、張文彬編著
1953 《衛生學》，臺北：正中書局。
- 齊如山
1993 《故都三百六十行》，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 蔡承惠編著
1982 《臨床傳染病學》，臺北：大學圖書出版社。
- 鄭壽彭
1980 《宋代開封府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 鄧雲特
1966 《中國救荒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臺一版。
- 戴佛香
1978 《微生物與疾病》，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謝國楨
1934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商務印書館。
- 韓光輝
1996 《北京歷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蘇同炳
1969 《明代驛遞制度》，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 新宮學
1994 〈明代の首都北京の都市人口について〉，《山形大學史學論集》
11：23-46。
- Benedict, Carol
1996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aude, Abraham I., Charles E. Davis & Joshua Fierer (eds.)
1986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Medical Microbiology*. Hong Kong: W. B. Saunders Company.
- Cartwright, Frederick F.
1972 *Disease and Histo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 Chang, Chia-Feng (張嘉鳳)
2002 "Disease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s, Diplomacy, and the Military: The Case of Smallpox and the Manchus (1613-1795),"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 57.2: 177-197.

Dunstan, Helen

- 1975 "The Late Ming 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 *Ching-Shih wen-t'i* 3.3: 1-59.

Gorbach, Sherwood L., John G. Bartlett & Neil R. Blacklow (eds.)

- 1992 *Infectious Diseases*.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Company.

Gottfried, Robert S.

- 1983 *The Black Death: 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Robert Hale.

Karlen, Arno

- 1995 *Plague's Progress: A Social History of Man and Disease*.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eung, Angela Ki Che (梁其姿)

- 1987 "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 Zi Region," *Late Imperial China* 8.1: 134-166.

- 1993 "Diseases of the Premodern Period in China," in Kenneth F. Kiple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54-362.

McNeill, William H.

- 1976 *Plagues and Peoples*. Garden City, NY: Anchor Press/Doubleday & Company. 中譯本為：楊玉齡譯，《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1997。

Parsons, James Bunyan

- 1970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Rosen, George

- 1993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xpanded edition.

Twitchett, Denis

- 1979 "Population and Pestilence in T'ang China," in Wolfgang Bauer (hrsg.),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Herbert Franke*.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pp. 35-68.

Wain, Harry

- 1970 *A Histor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Springfield, Illinois: 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

Wakeland, Joanne Clare

1982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 in Ming China: Sixteenth Century Peking.*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Wu, Lien-Teh, J. W. H. Chun, Robert Pollitzer & C. Y. Wu

1936 *Plague, A Manual for Medical and Public Workers.* Shanghai:
Weishengshu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The Epidemics in Ming Beijing and the Responses from the Empire's Public Health System

Chung-lin Ch'iu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In this article, I traced each epidemic outbreak of Ming Dynasty's Beijing, including the symptoms, the urban sanitary conditions, an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s. There were 15-recorded outbreaks in Beijing throughout the Ming Dynasty. Except for two, all occurred after 1540 and mainly during the reigns of Jiajing (1522-1567), Wanli (1573-1620) and late Chongzhen (1628-1644). The worst case was the pandemic of 1643.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these epidemics included smallpox, "big head plague," "sheep's wool plague," "pimple plague" and "vomit blood plague." The 1643 "pimple plague" and "vomit blood plague," judging by the symptoms, were possibly bubonic plague and pneumonic plague. During each outbreak, the empire's public health system, led by the Imperial Medical Department, played a major role in fighting the disease. It actually functioned in the reigns of Jiajing and Wanli, but failed miserably during the 1643 pandemic. Since the outbreak went uncontrolled, it claimed 200,000 lives in Beijing that year, and therefore severely compromised Beijing's defense against Li Zicheng's siege in the next year. The 1643 pandemic indirectly caused Beijing's fall and the demise of the Ming Empire.

Keywords: Beijing, epidemic, bubonic plague, public health, medical system